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六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一九五六年一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九日）

一

恩来同志：

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2]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来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3]，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

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敬礼！

毛　泽　东

一月八日上午二时

有些指标数字尚待填入的，待廖鲁言[4]同志回京后，查明填入。

二

恩来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5]，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6]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53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7]，将未改的52本加以改正。

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我拟于今晚

十时动身返京。

　　敬礼

毛　泽　东

一月九日上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⑸ 对于由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⑹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

四

　　蔬菜是一项重要的副食品。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民应当有计划地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五

　　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

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积储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区、乡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定出实现这个要求的具体规划。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

六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

七

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八

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为了便利

社员从事生产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为了改善社员的卫生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

九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注　释

⑴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先后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将“十七条”发至各地征询意见。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旬，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商量的意见，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十七条”进行多次补充和修改，逐步形成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这个草案，一月二十三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一月二十五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一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本篇（三）至（九），是毛泽东对纲要草案稿（当时为三十六条）的修改，其中（三）至（八）改在“第三天会议改正稿”上，具体修改时间

不详，(九）改在毛泽东这次修改抄清稿上，在标题上方注有："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稿"。文中毛泽东修改的文字，用宋体字排印。

⑵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国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

⑶　指为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至九日在杭州召开的部分省委书记会议。

⑷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⑸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条款是在讨论修改过程中逐步增加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的改稿为二十二条，一月七日前增加到三十六条。在一月七日的铅印件上，根据毛泽东前一次批注的意见，增加了有关青年的一条，并加写了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一条，共三十八条。一月八日的铅印件上，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两条，成为四十条。

⑹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⑺　指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一月九日)。在这一稿上，毛泽东写有："送周总理。其余各本，请照此本改正。毛泽东"。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值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且正充满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最近阿尔巴尼亚参加联合国的事实定将使阿尔巴尼亚今后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1月10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给 齐 吉 树[1] 的 信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齐吉树同志：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

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有手稿）

注　释

〔1〕　齐吉树，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期间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

关于控制高级社发展数目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

先送廖鲁言[2]同志办，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3]，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4]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5]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毛　泽　东

一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廖鲁言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转报王任重关于湖北省发展高级社的控制数目问题的电话请示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目前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关于高级合作化问题，一部分同志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发展一万个高级社（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同志主张放手发展高级社，达到全部农户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基本上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仍按省委计划发展比较稳当。廖鲁言在报告中表示同意王任重的意见。王任重在电话中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2〕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⑶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⑷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⑸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上发出的号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见本册第6页注⑵。

对达赖喇嘛[1]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达赖喇嘛：

你在一月一日给我的新年贺电收到了。谢谢。我衷心祝你身体健康，并盼你在新的一年内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对班禅额尔德尼[1]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班禅额尔德尼：

谢谢你的新年祝贺。过去一年内，日喀则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有进步，我们听到了都很高兴。现在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西藏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都是要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的。在新的一年内，你们那里也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我祝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注意研究解决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四月十一日）

一

陈云[1]同志：

此件[2]请你注意研究一下。

毛　泽　东

一月廿一日

二

刘、周、陈、邓、彭真[3]同志：

此件[4]值得一阅，并应予以解决。

毛　泽　东

四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二号《情况简报》摘报的“小学教师的一些意见”。此件反映了许多小学教师来信中提出的薪金低、入团入党困难、工作忙累、找爱人难等问题。

⑶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⑷　指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第七十八号《情况简报》摘报的“小学教师中的一些问题”。此件反映了当时小学教师中存在的待遇低、地位低、质量低三个主要问题。

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后面的一些文字[1]

（一九五六年一月）

四百斤问题[2]（水的问题）。

储粮两年问题。[3]

十二年基本消灭十种病虫害问题（加了"可能的"的限制）。[4]

省内外移民1000万户、垦荒五亿五千万亩问题（与国营数是否有重复？）。[5]

治病问题（加了"在一切可能地方"一句）。[6]

除四害问题（作了限制，应无问题）。[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为会议文件之三印发。毛泽东在这个印件上对纲要草案又作了修改，并在另外一页纸上写了本篇这一些文字。这一些文字，主要是对纲要草案中他所作的一些修改的说明，其他是表明他对纲要草案中某些问题的思考。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即将第二条中老解放区和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基本完

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八年改为一九五七年，其余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九年改为一九五八年，即分别提前了一年。

⑵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六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以北地区，由现在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

⑶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七条规定："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积储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区、乡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定出实现这个要求的具体规划。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

⑷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十八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例如蝗虫、粘虫、棉蚜虫、稻螟虫、玉米螟虫、红蜘蛛、红铃虫、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毛泽东在其中的"基本上"三字前面，加写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八个字。

⑸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十九条规定："垦荒移民。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垦荒五亿五千万亩，省内和省外的移民共一千万个劳动力，大体上也就是一千万户。"第二十条规定："发展国营农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万亩增加到二亿四千万亩。"毛泽东对这两条作了批注："两项是否

有重复？" 还将第二十条中的"二亿四千万亩"改为"一亿四千万亩"，并在"四百万亩"旁划一问号。《纲要（草案）》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时，第十九条删去了垦荒和移民的数字。第二十条的这段话改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36万亩增加到14，000万亩。"

⑹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二十六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的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白喉，疟疾，天花，性病。"毛泽东在其中的"基本上"三字前面，加写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八个字。

⑺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四害。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对廖鲁言[1]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

尚昆[3]同志：

此件[4]请即付印，校对勿讹，印350份，于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时带到勤政殿，发给到会的人，每人一份（共有320人左右）。

毛　泽　东

一月廿五日零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要请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一百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专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十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向上海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失业人员移五十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待说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注　释

⑴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⑵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廖鲁言的说明稿比较集中修改的两段。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⑷　指经毛泽东改定的廖鲁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

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

民日报》新闻稿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关于发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即送人民日报

邓拓[1]同志：

这篇社论[2]不能用，因为完〔全〕和廖鲁言的报告[3]重复，并且还不及报告的详尽。我看，有了那篇报告，不写社论也可以了。如果要写，要由你们自己写，并注意不要和廖的报告重复。

毛　泽　东

一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为《人民日报》写的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稿。

[3]　指廖鲁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给 宋 庆 龄[1] 的 信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养身体。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给黄宗溍[1]的信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黄先生：

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一千元，聊佐杯水之资。

敬颂教祺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黄宗溍，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地理教员。

给许志行[1]的信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志行兄：

十月八日惠书早已收到，甚为感激，迟复为歉。现在是寒假，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北京一叙（到中南海找叶子龙[2]）。暑假可去韶山。

祝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许志行，一九一九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一九二六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

〔2〕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小平⑴同志：

此件⑵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

毛　泽　东

一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⑵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民革、民盟、九三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和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召开中央会议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就民主党派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等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以下意见：㈠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问题。报告说，由于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展，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些民主党派不仅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现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肯定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他们今后总的任务应当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动他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

争，并在实践和学习中获得进一步的改造。（二）关于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报告说，民盟、九三学社、民进和农工民主党等以文教科学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党派，可以要求他们的成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首先从正面推动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使他们增强信心，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掌握思想武器，在此前提下，引导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三）关于组织发展问题。报告说，这些民主党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展他们的组织，拟推动他们各自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发展组织的规划。此外，报告还对民主党派开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改选领导成员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关于建立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

毛　泽　东

一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团中央准备在全国农村推广青年生产队问题给邓小平的报告上。报告说，经过征询有关同志的意见和初步研究，觉得青年生产队的形式在试办过程中确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在发展当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提出青年生产队的队员都要身强力壮、思想进步的，这样办就会使得强劳力和积极分子过分集中，影响到合作社内整个劳动组织的合理调配和其他队的生产。目前普遍建立青年生产队，条件和经验都不成熟。

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修改[1]

（一九五六年一月）

一

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

二

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三

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

既往。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关于检查同苏联专家、顾问关系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一

此件⑴值得看一下。似须整个检查一次同各方面顾问专家的关系。

毛　泽　东

一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刘、周、陈、小平、彭真⑵阅，尚昆⑶存。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谈话的纪要。总顾问说，一些苏联军事顾问反映，中国同志目前已经不需要他们，不交给他们工作做。他自己有很多话也无处谈。彭德

怀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双方还就缩减顾问编制和中国军队装备现代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汪东兴[1]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一

汪东兴的考察报告。

此件[2]提出了一些问题，可以一阅。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二

尚昆[3]同志：

此件请你印100份，发各政治局同志、农村工作部及中央警卫队约八十人，每人一份。

毛　泽　东

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

部长。

⑵ 指汪东兴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一日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全省初级社入社农户已达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八。春耕前，群众结合搞生产规划，已在酝酿办高级社。有的地区已经铺开，计划今冬明春基本实现高级社。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抗水灾、旱灾能力差，农用机器短缺，劳动力不足，牲畜、种子少，购买困难等。关于今后高级社的发展规划，省委打算分两步走（先试点，再扩大），但怕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如并作一步走，又担心工作缺乏经验，难以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产。目前省委正在研究，还未作出定论。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刘松林[1]的信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　胜[2]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

注　释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一九四九年十月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

[2]　得胜，即李得胜，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使用过的名字。

吊唁杨树达[1]逝世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转
杨树达先生家属：

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根据审定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与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逝世前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1]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2]阅，退定一[3]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4]，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5]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　泽　东

二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给中央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请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研究室主任。

⑶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⑷　指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⑸　尤金，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

转发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二十日）

一

廖鲁言[2]同志：

此件[3]可以转发各地。

毛　泽　东

二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刘、周[4]阅，尚昆[5]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江苏省委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关于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中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日转发江苏省委报告的批语稿上写的批语。

〔2〕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

长。

⑶ 指中共江苏省委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关于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给中央和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打开了大家的眼界和思路，不断克服了各种保守思想，注意纠正了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在此基础上，分稻麦区、杂谷区、棉区、山区大组交流和总结了丰产经验：一、合理改变耕作制度，增加复种面积，争取全面增产；二、积极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兴修农田水利，增积自然肥料，改良土壤，增添耕牛、农具；三、积极改进栽培技术，从选种到收获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四、因地制宜地抓主要增产措施。会议还进行了全省高额丰产的布局，规定了有关竞赛运动的办法，并分片、分级、分等规定了不同的粮棉丰产指标。

⑷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⑸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发表郭沫若[1]访日诗篇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送彭真[2]同志：

内件[3]请交北京日报发表。其中有些草体字须先改为楷书，以免弄错。

毛　泽　东

二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3〕　指信封内装的郭沫若访日诗篇七首。郭沫若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这些诗是他访日期间写的。信封内的七首是："箱根即景"，"访须和田故居"，"别须和田"，"宫岛即景"，"访博多湾"，"留别华侨"，"游别府"。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时，将"访博多湾"和"留别华侨"分别改题为"吊千代松原"和"归途在东海道车中"，又增加了"宿春帆楼"和"船入长江口"两首，这九首诗总题为"访日杂咏"。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六年二月）

一

刘、周、瑞卿[2]再阅，在尾上加了几句。

毛　泽　东

发后，抄公安部。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审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写在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关于当前社会镇反工作意见的报告的批语稿上的批语。本

篇（二）是在中央批语稿末尾加写的文字。中央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将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上海局、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五日、七日）

一

送中央卫生部
徐运北同志：

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

毛　泽　东

三月三日

二

尚昆[2]同志：

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3]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

有无准备？

毛　泽　东

三月五日

三

中央卫生部

徐运北同志：

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订定下一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水生动物研究专家秉志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为转送他给毛泽东的信而写给刘少奇的信上。秉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本篇（二）写在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给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的电报上。本篇（三）写在卫生部副部长徐

运北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等吊唁贝鲁特[1]逝世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同志：

惊悉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是波兰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卓越战士。他的逝世，对于波兰人民和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极大的损失。

我们深信：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生前的光辉事迹将永远鼓舞我们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波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而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同波兰人民在一

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3月13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⑴　贝鲁特，即波莱斯瓦夫·贝鲁特，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全国阵线全波委员会主席。

关于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3月17日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3月17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拉科西的信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敬爱的马加士·拉科西同志：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了。

我们了解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困难，并且愿意尽可能帮助你们克服困难。根据你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可能，我们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内增加供应你们价值三千万卢布的货物。我们已经指示我们对外贸易部立即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商谈供应货物的品种和数量。

谨致

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信稿刊印。

对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一

刘、周、彭真、小平[2]阅，尚昆[3]办。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部党组的汇报，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

三

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

央，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⑷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⑴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⑷　中共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内容，共有十项：（一）目前各省、市、区的主要经济状况。（二）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三）对全国和本省、市、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本省、市、区的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四）当前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竞赛高涨的情况，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各方面的潜力表现在哪里，如何具体地在生产、基建、运输、流通各方面发掘潜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六）地方党委对地方各种企业和中央国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加强领导，如何进行统筹安排。（七）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八）私人工商

业、私人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和意见。(九)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分工的意见，对工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的意见。(十)对资金积累、负担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见。提纲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向中央的汇报，应当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对其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中央的这个汇报提纲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发往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刘、周、彭真⑴阅后，退小平⑵照办。

毛　泽　东

三月卅日

国务院春耕指示⑶（此件已退习⑷办）于四月一日见报，此件⑸应待一二天，可于四月三日或四日见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⑵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指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⑷　习，指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⑸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指示指出：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和农民群众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了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的现象。为此，首先要求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广泛深入地宣传勤俭办社的方针，使每

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和全体社员都能够切实了解和坚决执行这个方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分清先后缓急，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和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量力而为。合作社的文化福利事业，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举办，并且应当力求节省，简单朴素，在公益金中开支费用。必须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合作社的财务计划和计划外的开支，必须按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提交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改进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农业银行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大量的农贷来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支持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合作社贷款用途的审核工作。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副业生产，经营多种经济，这是勤俭办社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指示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

一

少奇、小平[2]同志：

社论[3]已由陈伯达[4]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5]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　泽　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二

照此[6]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

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毛　泽　东

四月四日上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

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五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六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

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七

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

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八

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九

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

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

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十一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根据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加写的题下说明。本篇（四）至（十一）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至四日多次审阅这篇文章时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

⑵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⑶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毛泽东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⑷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⑸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⑹　指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作的修改，即本篇（三）（七）（八）（十）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

对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

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央各同志意见，在他们看过文件后，即会告知你。

毛　泽　东

四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报送关于军委扩大会议结果的报告和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简要报告上。彭德怀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主要讲了以下问题：第一，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第二，战略方针问题的提出；第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第四，关于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问题；第五，关于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第二，动员准备工作；第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意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福州两军区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

刘、周、朱、小平[1]阅后，退彭德怀[2]同志。

此件[3]看过。同意划分为两个军区。叶飞[4]的省委书记是否可以不再兼了，何人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请小平和谭震林[5]商定告彭。

毛　泽　东

四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 指彭德怀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建议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军区（辖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军区）和福州军区（辖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给毛泽东的报告。

[4]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省长。

[5]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接受丹麦大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递交的丹麦国王所签署的国书，并且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自从 1950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丹麦王国建立邦交以来，贵我两国的关系沿着友好的道路向前发展着。今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贵我两国协议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几年以来，中国人民杂技团，中国古典歌舞剧团曾经赴丹麦演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丹麦，中国工农业和艺术展览会也曾经分别在哥本哈根举行。丹麦的工会和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1955 年丹麦工商界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进行了贸易谈判，扩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这些友好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而贵我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加强，是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和平的。

我深信在贵大使的努力之下，贵我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贵我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丹麦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发展中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增进中丹两国经济、文化联系的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予以充分的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且祝贵国元首健康。

根据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就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1]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

一

彭真[2]同志：

略有修改[3]，主要是发到县级，于五月份收集意见上报。

毛　泽　东

四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关于征询对蒋、日、伪

战犯的处理意见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各党组的通知。通知说，目前对于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在各地讨论之后，中央当年没有作实行特赦的决定。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对上述罪犯实行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日发布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十二月四日特赦释放了首批战犯二十三名。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见本篇（二）。这是毛泽东在中央通知稿末尾加写的一句话。

关于请中宣部讨论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

张际春⑴同志：

此件⑵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⑶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毛　泽　东

四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⑵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摘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三月三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哈格尔还说，在哲学上

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⑶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位委员：

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　泽　东

1956年4月20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为印发徐运北[1]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廿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

毛　泽　东

四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徐运北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有十四个省、市的党政代表参加。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

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报告还附有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验方一份。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报告时，还加了题目“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和题下注“（这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值得大家一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注）”。

给毛宇居[1]的信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借纯珠[2]兄之便敬致问候之意。

即祝

兴居康吉！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2]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兄弟。

给毛华珠[1]的信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华珠兄：

纯珠[2]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康吉！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华珠，即毛泽田，毛泽东的堂兄弟。

〔2〕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兄弟。

给毛泽荣[1]的信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顺祝

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论　十　大　关　系[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

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

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

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

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

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

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

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

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

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⑵，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

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3]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4]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5]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

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

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6]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

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⑺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⑻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

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9]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

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 革命。其实，阿Q 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

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

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0〕。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

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整理稿。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其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五月二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讲话，其内容与四月二十五日讲话大致相同。这篇讲话，曾经有过一个整理稿，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一九六五年底，刘少奇建议将这个整理稿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

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这个整理稿对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苏联问题）没有整理进去。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按照毛泽东批准的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的意见作了整理，补上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新的整理稿于同年七月十日送邓小平，十三日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审阅后即批示："同意。"这篇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整理稿，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⑵ 高，指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指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⑶ 卫立煌，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卫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到北京，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翁文灏，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不久辞职出国，寓居巴黎。一九五一年回国，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常务委员。

⑷ 龙云，原云南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因与蒋介石有矛盾，逐渐支持反蒋民主活动。一九四九年八月在香港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梁漱溟，三十年代在山东、四川等地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四十年代参加过民主活动，曾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名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脱离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彭一湖，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等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

⑸ 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⑹ 胡风，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一九三三年七月起，先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一九六五年被判刑。一九八〇年九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本人平反。一九八一年，胡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

〔7〕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九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等职。一九五五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一九六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并被判刑。一九八二年八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平反昭雪。饶漱石，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因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8〕 宣统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康泽，原国民党特务头子。一九四七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六三年四月被特赦释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9〕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

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

〔10〕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的。

倡议实行火葬[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

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　释

〔1〕　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本篇题下的年月日是毛泽东签名的日期。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一九五九年二月十日，陈云给杨尚昆写信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给贺果[1]的信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培真兄：

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

顺祝

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贺果，字培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局长。

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

一

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

此件[1]发给你们参考。西藏方面前往康区的考虑〈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乱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如果他们愿意到成都和北京走一趟则更好。

中　　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

二

请四川省委和西康党委注意：拉萨方面所说引起叛乱

的四条原因，请按实情加以分析，对于即将到来的拉萨考察团予以符合情况的说明—— 中央注。⑵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央代表团党组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西藏政治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央代表团自北京出发的同时，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在喇嘛、贵族上层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惧，怀疑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和代表团的来藏是来搞改革的，对这两件事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淡。经过召开上层分子座谈会，广泛地进行拜会、访问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各种活动，宣传中央的政策，解释误会，揭露谣言，局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已胜利闭幕。估计再继续进行一些工作之后，拉萨的局势可进一步安定下来。报告还谈到，达赖提出派人组成代表团去四川藏区，协助当地党政进行宣传和安抚工作，我们已表示同意。

⑵　中央代表团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拉萨对四川藏区叛乱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传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叛乱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引起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报告所说的这四条原因后加的一个批注。

公布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5月12日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5月12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

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以上各项，每一个问题写几千字即可，均要分开写，各成篇幅，不要连在一起。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

中　　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写在湖北省财贸工作汇报提纲后面的文字[1]

（一九五六年五月）

资本家〔企业〕国家有化慢一点：

⑴ 抓住他们的尾巴；

⑵ 可得息钱；

⑶ 有时间，我们主动一点。

经验：

人事与业务的安排要迅速；

经济改造要逐步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毛泽东的这些文字，写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关于湖北省财贸工作的汇报提纲（草稿）最后。在提纲封面上毛泽东写有“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廿日”的字样。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1]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中　　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即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见本册第116—117页。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

退陆定一[2]同志。此件[3]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

毛　泽　东

六月八日

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4]等同志商量一下。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陆定一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为送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因为有二百个科学家集中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少奇同志指定我去讲。讲稿起草后，中宣部讨论了两次，后又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五月二十六日在两千人的会上作了报告，会后收到来信七十封。根据这些意见又加修改，成为现在的稿子。同时送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来信五件。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将这段删去。但因为这一段的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这篇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⑵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⑶　指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

⑷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袁水拍，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何其芳，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和贵国总统对我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的好意和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寻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所有邻国执行睦邻政策。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兴地看到，中国同巴基斯坦自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的贸易文化交流和相互友好访问正不断地得到发展。

我国政府和我本人欢迎阁下的新任。我们珍视阁下在过去一年多来为加强中巴两国友谊所作的努力，并且愿意在这方面继续给阁下以充分的协助。

祝阁下在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贵国元首健康！

根据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通知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1]，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帐，借以教育

干部和群众。

中　　央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关于湖南省攸县农村情况调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反映了该县农村日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县、区、乡、社只注意粮食生产，放松了其他生产，因而不能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二、合作社对五保户实际上只实行了一保，即有饭吃，不饿死人，没有替他们作好生产安排和生活安排，实现五保。三、农村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讨饭和主要吃稀饭的人没有了，有的乡平均生活水准已达到中农程度，但吃不到豆腐、油、猪肉等，群众有意见。四、产稻地区对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在十二年内储备两年粮的要求有异议，因为两年陈谷即变质。五、除四害，一般行动不多，信心不强。

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一处带原则性修改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可以这样修改。

毛　泽　东

六月廿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的信中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修改稿中，第十四条加了一句“必要的时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这是比较带原则性的修改，请酌是否合适。彭真转报刘少奇时写的信中说，“我觉得改得可以。但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的社员，与鲁言、总理电话商后，觉得还是用公益金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不给土地报酬为好”。刘少奇表示“拟同意照这样修改”。毛泽东看后，在“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一句旁边批写：“可以这样修改”。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章程时，将这句话改为“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应该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章程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接受罗马尼亚大使
尼古拉·乔洛尤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国家。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罗马尼亚人民得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解放以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罗马尼亚人民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合作和兄弟友谊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

根据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56年6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6月30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七月九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达·阿吉尔毕希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三十五年来，蒙古人民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对加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对于兄弟般的蒙古人民的成就感到万分高兴。

祝蒙古人民在和平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中蒙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7月9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七月九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7月9日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7月9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国庆阅兵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

刘、周、朱、陈、彭真、小平[2]阅，退彭[3]办。

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毛　泽　东

七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关于今年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究应如何，请中央确定。报告还提出，近年来，国庆节阅兵所发布的命令内容大体相同，今年阅兵时拟不发布命令，是否可以，请中央决定。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对中央转发王观澜[1]关于江浙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2]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报告中的第二项[3]“为农民算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个算法与实际税收和农民负担有某些出入，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摸底，也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和真正了解农民的经济情况，各级党委都应当进行这样的调查，地委、县委在一两个乡或者在一两个合作社内进行调查，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一两个县直接去进行典型调查。这项工作应在夏季布置，以备秋季之用。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如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王观澜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第二项。这一项主要是谈为农民算帐问

题。报告说，在浙江临海县曾为农民农副业的收支算了一次帐。在农业方面，按每人约有一亩三分田地、平均每亩年产量四百八十五斤计算，扣除农业税，生产成本（种子、肥料等）后，大概每人可得原粮四百五十四斤，折人民币三十一元八角，每月可得二元六角五分。副业方面，找不到必要的材料算一次细帐，据一九五五年统计，浙江副业和土特产产值占农副业总产值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但目前均有下降趋势。临海县养猪只完成今年计划的三分之一。因此，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也只有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

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送李维汉[2]同志酌处。

下面有些人不赞成这种变更。究竟是否应当变更，请审议酌复广东〈西〉[3]。

毛　泽　东

七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广西省委统战部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给中央统战部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毛泽东在五月下旬曾口头指示：暂时停止进行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的工作。为了便于执行，请给以明文指示。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草拟了中央关于更改区级和乡级民族自治区问题给广西省委的复电，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电报指出，对这一问题，各地少数民族中都反映了一些意见，应该分别不同情况，适当地加以处理。凡是可以改建、扩建或合并建立自治县的区级自治区，即可着手建立

自治县；但对那些确实不能更改为自治县，而当地民族人民又不愿意更改为区公所或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区级自治区，决不可以强迫他们更改，应一律暂时停止更改，留待以后再说。至于改建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为民族乡的问题，如果当地少数民族不同意，也可以暂缓处理。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八月上旬的批语[2]

一

经济数字太少（成就）。

苏共二十次。

国防。

华侨、工、青、妇。

二

不能完全归咎下面，中央也要负一部责任。[3]

三

革命也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些文化。[4]

四

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5]

五

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6]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八月中旬的修改[7]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八月二十一日的修改[8]

一

在不久以前，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

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现在世界上民族的醒觉运动的高潮还在继续发展，它的规模来得非常广阔，它将继续取得重大的胜利。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打击之下，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个十分丑恶的东西，已经日益显得陷于孤立，并且正在走进彻底瓦解的过程之中。不论是英法等欧洲旧的殖民帝国的挣扎，还是美国建立新的殖民帝国的努力，都将受到彻底的失败。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帝国的崩溃，将是人类的最后解放。总之，原来由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宰割世界广大地区的局面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局面已经永远地一去而不复还了。

三

在今后，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在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下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避免战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就确实出现了。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

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组成了一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长期占领西德和日本，并且占领南朝鲜和我国的领土台湾，大规模地进行扩军备战，从而造成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据说这是为了要"防御共产主义的侵略"。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大嚷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却不仅仅在这里，他们首先和主要的目的也不在这里。

这个集团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得很紧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碰倒的，要碰这个阵营的壁垒，势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社会主义阵营按其本质和实际情况完全不需要向外侵略，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共产主义侵略”可以“防御”的。而他们需要防御的，却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以及他们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五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

六

帝国主义者还会要在许多地方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因此，斗争还会要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

七

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内和其他国家人民力量的支持，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外部保卫了我们革命的胜利。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

在和声援。[9]

八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曾经屡次试探是否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变革，并且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一道，曾经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我们认为这种和平试探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作这种试探的活动中，我们党没有放弃警惕性，没有放弃自己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这对于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我们当然应当争取这样做。但是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有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发动者自食其果。

历史所作的实际结论正是这样。战争的结果把被美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从中国的统治地位推落下去，旧中国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被彻底打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变成了全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革命的方法是战争，是革命方面用强力打倒反革命方面的强力。但在战争过程中间，也有几个地方经过和平谈判而获得解放，例如北京、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以及西藏的大部分地方，就是这样。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

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一个关系到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内，当着时机成熟了的时候，是否应当夺取政权的大问题。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就真正出现了。这种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即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而不用强力压制的方法。



十

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中国革命不可免地将在世界上引起种种的结果,这是历史的规律。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没有不互相影响的。

十一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

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

十二

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十三

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必须争取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必须继续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必须继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必须继续巩固同农民的兄弟联盟；必须继续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今后应当积极完成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八月二十四日的批语和修改〔10〕

一

退少奇同志：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毛　泽　东

八月廿四日

这里已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11〕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虽然革命根据地包括了上亿的人口，因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且在根据地内执行了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最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们并不去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三

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

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

四

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六

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

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八月二十九日的批语和修改〔12〕

一

退少奇同志：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13〕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毛　泽　东

八月廿九日

二

退陆定一〔14〕同志：

此件〔15〕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增加了两个小段，请加斟酌。

毛　泽　东

八月廿九日

三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四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八月三十日的批语[16]

退少奇同志：

可以这样编排[17]，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18]。

毛　泽　东

卅日

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根据手稿刊印。

八月三十一日的批语和修改[19]

一

伯达[20]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

毛　泽　东

卅一日三时

二

即退胡乔木[21]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

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22〕，请乔木注意。

毛　泽　东

卅一日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四

乔木同志：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毛　泽　东

八月卅一日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六日的批语和修改[23]

一

即送乔木同志：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毛　泽　东

九月六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为了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初办的合作社，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三

伯达同志：

周总理及洛甫[24]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

与总理联系，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

毛　泽　东

九月六日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七日的批语。

一

周总理：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六时

二

乔木同志：

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

不知 15 页上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没有？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六时

三

伯达同志：

“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25〕，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七时

四

周总理：

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26〕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27〕，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十时

五

乔木同志：

“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28]谈一下。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八日的批语

一

伯达同志：

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29]，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八时

二

少奇同志：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

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九时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九日至十三日的批语

一

尚昆〔30〕同志：

少奇同志修改处请交翻译注意照改。改印，暂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见交来，汇总修改，并经少奇和我看过后，再行付印。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八时

二

伯达同志：

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31〕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抄三份，分送刘、周〔32〕及我。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五时

三

少奇同志：

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

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修改的。

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冒〈帽〉子及一至四〔33〕）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九月十二日下午送回中央。

毛　泽　东

九月十一日四时半

四

少奇同志：

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34〕。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二时半

五

即送少奇同志：

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35〕，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七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九月十四日的批语

一

即送少奇同志：

（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

（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再改。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二时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二

伯达、乔木、家英〔36〕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三

杨尚昆同志：

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陈伯达同志等的修改稿，要今天下午才能交出。据我看，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在讨论、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写了

不少批语，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本篇收入的是他在多次过程稿上的批语和加写、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用宋体字排印。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这篇报告，报告的全文发表于同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⑵ 八月上旬的批语中，㈠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五六年八月八日印发的《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初稿）》的封面上，㈡至㈤写在政治报告初稿有关文字的旁边。

⑶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五十五页上，这页上的内容主要是说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着只追求数量和曲解节约而不管质量的错误思想和极其有害的自满情绪，结果造成了一九五五年有些工程的质量事故。

⑷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七十八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承认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根据中国革命胜利的老经验来否认提高文化的迫切需要。是的，当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在那个时候，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

⑸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一百一十一页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一段文字的旁边。

⑹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一百四十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

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

〔7〕　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送给他的政治报告稿中“党的领导”部分所作的修改。

〔8〕　这里收入的是毛泽东审阅政治报告（修改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部分所作的十三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在这两部分修改稿前面，有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写的“此件即刻排印”、“今日十二时前印好”等批语。

〔9〕　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修正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部分时，对中国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迅速胜利的第三条主要原因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前两条主要原因是：一、战后的中国人民不愿意退回到原来受蹂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

〔10〕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部分时写的批语和作的比较集中的修改。这一部分的题目是毛泽东审阅时加拟的。

〔1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12〕　这里的（一）和（二）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和“国际支援”三部分时所写的批语。（三）和（四）是他审阅政治报告稿“国际支援”部分时加写的两段文字。

〔13〕　指政治报告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部分。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为送审“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改写稿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

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14〕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15〕 指政治报告稿“共产党”和“国际支援”两部分改稿。

〔16〕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关于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的各部分编排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17〕 刘少奇送给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各部分编排的顺序是：

“序言

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三、社会主义改造

四、社会主义建设

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

工业

农业

商业

文化教育

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民族问题

关于华侨问题

关于我国的国防问题

关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关于官僚主义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问题

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

六、共产党

七、国际支援”。

〔18〕 政治报告稿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在修改过程中有多次变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其各部分的顺序为：开头部分；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㈡社会主义改造；㈢社会主义建设（下面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五个小标题）；㈣国家的政治生活；㈤国际关系；㈥党的领导。

〔19〕 这里的㈠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部分时所写的批语；㈡㈢是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时所写的批语和修改；㈣是关于压缩政治报告稿头几部分文字的批语。

〔20〕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2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22〕 这一页上讲到，“在第一个五年内，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因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只约占百分之五十八”。毛泽东在这一句话旁边写了批语：“还有百分之十的开支要作交代。”这句话后来修改为：“在第一个五年内，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在第一个五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除用于信贷基金、归还国内外债务、援外、总预备费等项共约占百分之十以外，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百分之五十八。”

〔23〕 这里的㈠㈡是毛泽东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

义建设”部分时所写的批语和修改；㈢是关于周恩来联系修改政治报告的批语。

⒇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25) 指政治报告稿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

(26)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7) 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28)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29) 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30)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1) 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3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33) 指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㈡社会主义改造，㈢社会主义建设，㈣国家的政治生活。

(34)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35) 这些文字原加写在以下一句话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苏联给了巨大的援助；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给了种种的援助。”

〔36〕 家英，即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一

第三十七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二

即退小平[2]同志：

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当添三个字[3]，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廿二时

在第三条加了三个字。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审阅邓小平一九五六年八月五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三十七条条文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稿的批语。

⑵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起草的工作。

⑶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三条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第一款是：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毛泽东在其中的“实际问题”前面加上“理论和”三个字。

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

一

要一个说明理由的文件，供内部用。

二

400—450亿（军），130—140亿（政）＝530—590＝2350亿的22%，比现32%，减10%；其他支出：⑴还外债，⑵援外，⑶物资贮备，⑷总预备费，⑸信贷资金，共计10%左右。

三

要把历史上最高年产量，1952年产量，1957年产量都列出绝对数字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周总理：

有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印的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第三次草稿上。本篇（二）是对第三次草稿中以下两段话的批语，这两段话是："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应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58%左右，提高到60—70%左右。"后来，建议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加写了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2%左右，下降为20%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本篇（三）写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印的这一建议草案中所列的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重工业产品的计划产量及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九五七年计划产量的百分比的数字表旁边，后来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分别列出了一九五七年计划产量、一九五二年实际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绝对数，删去了原有的百分比数字。本篇

（四）写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印的建议的草案修改稿上。毛泽东在此稿上所作的一些修改，主要是在文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以适应当地经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一句中的“各民族人民”后面，加写了“和领袖人物”五个字。

给曹云芳[1]的信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2]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3]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4]，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顺祝康吉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⑴　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⑵　罗哲，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牺牲。

⑶　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一九四九年九月起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⑷　指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八月）

似应有几句话劝告英法政府和英法人民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应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上。后来，这个联合声明改为中国政府声明，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发表了有关声明。根据毛泽东的批语，中国政府的声明增加了有关劝告英法政府的一段话："中国政府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主权行为是不容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的；有关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是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的。英国和法国在这次事件前，曾经采取过一些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比较明智的行动。中国政府希望，英国和法国将本着这种精神来对待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任何武力威胁和武力干涉的行为将必然引起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也决不会是有利的。"

给达赖喇嘛[1]的信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⑴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2]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

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

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⑶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⑷，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5]。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

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6]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7]。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⑻，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

“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9]中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10]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11]。演

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

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根据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2〕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傀儡集团统治下。

〔3〕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⑷　江亢虎，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解散。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他的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⑸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⑹　桐城派是古文中的一个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由于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把他们和他们这一派的人称为桐城派。这一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

⑺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考虑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例如他在一九一八年五月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说："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做到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由于资本家阶级一般地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设想没有能行得通。

⑻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

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

⑼　孔子的“六门课程”就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⑽　西太后即叶赫那拉氏，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一八六一年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因住在西宫，所以又称西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同时又盲目地排外。一八九八年，她镇压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运动。

⑾　隋朝的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据《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唐朝十部乐是：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其中，龟兹、康国、安国、疏勒、高昌都属于西域，高丽即朝鲜，天竺即印度。

在欢迎老挝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举杯，向老挝国王致意，祝他身体健康，向梭发那·富马首相致意，祝他身体健康，并且向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表示祝贺，向老挝王国全体人民表示祝贺。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和老挝是近邻，两国在历史上是友好的，近代两国间的关系虽然曾经有过中断，但是，现在在新的基础上、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开始恢复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毛泽东主席对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和五项原则的胜利表示祝贺。

毛泽东主席在致词以后，同梭发那·富马首相和卡代·敦·萨索里特〔1〕等一起干杯。

根据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注　释

〔1〕　卡代·敦·萨索里特，当时任老挝王国副首相。

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退邓小平⑴同志。

此件⑵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⑶，请你们酌定。第23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⑷，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

毛　泽　东

八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⑵　指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

⑶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修改稿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第一段，“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了“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十四个字。另一处是在报告最后第四段分析我们党的胜利的原因时，在“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前面，加写了“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这两处修改意

见,在邓小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采纳了。

⑷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第23页论述了党内民主并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七大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讨论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接着,报告稿列举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两条意见:一条是“1955年三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另一条是“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车的扩大的二中会议”。邓小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两条建议,加写了这四次会议。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一九五六年八月）

陈、陆、胡、王稼祥、李维汉、胡绳、田家英[2]。

a、大会宗旨：总结经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有用〔因〕素，外宾四十九国[3]，为建设社会主义为〈而〉斗争。

b、除了选举以外，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团结那与自己有过斗争的人[4]。

七大选票〈举〉经验是成成〈功〉的。

时间安排是充裕的。

资产阶级。

c、150—170[5]。

上届中委。

三八线[6]。

d、36小时发言时间[7]是充裕的。

前门饭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讲话提纲，写在印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日程安排、会议规则等六个文件的目录上。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⑵　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都参加中共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⑶　指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实际上，后来参加八大的共有五十六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

⑷　这里指要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又说："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说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

⑸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大正式选举出第八届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三人，共一百七十人。

⑹　"三八线"，这里指考虑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以"三八式"干部划线问题，即一九三八年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

部一般不进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

〔7〕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案）安排的九个下午约三十六小时的大会发言时间。

对彭德怀[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一

退彭德怀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

毛　泽　东

八月卅日晨

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虽然由于我军现代化建设为时不久，各军种、兵种还未能达到完全现代化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我国空前未有的规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

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

三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以便达到知己又知彼的目的。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⑵　本篇（一）写在彭德怀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为送审关于军事工作的发言的修正稿给毛泽东的信上。彭德怀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这个发言，原题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为《胜利完成军事工作的光荣任务》。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彭德怀发言稿所作的两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李立三[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退李立三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2]。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方面的修改，请加酌定。

毛　泽　东

八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2]　指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毛泽东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1]

（一九五六年九月）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	民族	籍　贯	入党时间	现在职务
毛泽东	男	1893	汉	湖南，湘潭县	1920	党中央主席 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使出席"八大"的每个代表的籍贯、出生年、入党时间、现任职务等情况做到准确无误，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代表登记表"，请各人自己填写。本篇收入的这张登记表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是毛泽东填写的。

关于修改和播发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十二日）

一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你看一下，并立即印发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附上一个通知，请他们于九月八日以前于原件上批上修改意见，退还中央。意见收到后均交邓老[4]负责修改，于九月十日前退还中央，准备于九月十二日发表。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六时

此件我看了一遍，大体可用。拟在征集修改后，再看一遍。

同时请总理提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十二日以前）。

二

此件用。退周总理。

即刻送新华社，立即广播，明十三日必须见报。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代拟稿的批语；（二）是写在最后改定的这一指示稿上的批语。

⑵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⑶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送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代拟稿。陈正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明，这个指示在起草过程中作过多次修改，现在送审的代拟稿，是根据前两天陈云主持召开的农业生产协作委员会会议的意见修改的，邓子恢、廖鲁言、王观澜、刘建勋等同志还没看，他们可能还有某些修改意见，但不会有大的修改。同日，邓子恢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进一步修改的指示稿。

⑷　邓老，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对陈绍禹[1]不能参加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可以印发各代表。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陈绍禹，即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正在苏联养病。

⑵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⑶　指陈绍禹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给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自八月七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曾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专电请假。"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

一

即送周总理：

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九时半

二

周总理：

你的报告〔1〕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2〕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十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在这里，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3〕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中说："不论是在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或者是在我们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我国都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苏联的巨大的和友好的援助，同时，也获得了各兄弟国家的援助。这种援助，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以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

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

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

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接受埃及大使拉加卜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第一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对我本人的友好祝贺。我愿意趁此机会通过贵大使向纳赛尔总统表达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的敬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埃两国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诚如阁下所指出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殖民主义者曾经阻碍过中埃传统关系的发展，但是赢得了各自的民族独立的中埃人民，又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珍贵同埃及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相信，这种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作为亚非两个爱好和平国家的中国和埃及间的友好合作，无疑地将对维护和巩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贵大使为发展中埃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会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充分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纳赛尔总统阁下健康！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任之先生：

画册[2]、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3]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画册，指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由黄炎培代呈毛泽东。黄炎培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在为送画册和诗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八大'快要召开，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流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八十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二十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最近工商界接受种种新的措施，特别是五厘定息，大、

中、小皆大欢喜。—— 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

〔3〕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于同年九月十九日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江苏省文史馆每月给他生活费五十元。黄炎培认为，如果政府给他照顾，他会接受的。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五百元。见本册第 268 页。

对周扬[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即退周扬同志：

此件[2]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

毛　泽　东

九月廿一日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2]　指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时，题为《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一

尚昆[1]同志：

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案〈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2]同志，以便修改。

毛　泽　东

九月廿四日五时

二

即送胡乔木同志：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

国家”几个字。

毛　泽　东

九月廿七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⑵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月）

一　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参加人：蒙方：达姆巴[1]（团长）、曾德、奥其尔巴特（大使）、哈什冈白、策热布桑巴

中方：王稼祥[2]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这几天你们很累了吧？

达姆巴（以下简称达）：不，不累，我们很舒服。

主席：蒙古同志是好同志，好朋友。你们是友好的国家，友好的党！

（接着主席就问候泽登巴尔[3]同志）

达：他很好，他跟桑布[4]同志向您问候呢！

主席：谢谢！请你们替我向他们问候！

达：谢谢！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援助。

主席：不，不要这样！中国是个大国，这是我们的义务，是

你们的权利。我经常听到你们这样讲，同时经常看到文件上也这样写，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过去我国国内少数民族也同样受过压迫，我们对他们也要还债，这是我们的义务。

我国藏族人口的一百二十万人直接属于拉萨，其他一百万人口分布于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蒙古的宗教情况怎样？喇嘛多不多？总人口多少？

达： 过去很多，现在非常少了。在革命初期，有些喇嘛干过坏事情，将他们处理了。有一些参加了劳动以及其他工作。现在还有极少数的喇嘛。我国总人口八十万。

主席：蒙古工农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达： 革命前我们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在革命的年代里，由于苏联的热情帮助，我国人民在工业方面、牧畜业方面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主席：蒙古农业也很发展了吧？

达： 今年刚开始发展农业。

主席：水够不够？

达： 在我国，水是很缺乏的。

主席：雨量如何？

达： 平均年雨量是一百二十至三百毫米（其中森林地带

是三百毫米，而沙漠地区是一百二十毫米）。

主席：打井怎样？

达：　沙漠地区打井困难。

主席：那么，建设一些蓄水库，储下水来，以供使用，这样不可以吗？

达：　在沙漠地带很困难，水储不下，很快渗入地下。

主席：你们境内有哪些大河流？

达：　色楞河、鄂嫩河、克鲁伦河等。

主席：向西北方向流去的是哪一条河？

达：　鄂嫩河、克鲁伦河。

主席：蒙古历史、文化的发源地是哪里？

达：　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

主席：你们不可以在这些河流上建筑一些水闸、水库、蓄洪沟等工程吗？

达：　人民和我们都迫切要求那样做，但力量达不到。

主席：现在我们也有些困难。但几年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你们。

达：　谢谢。

主席：今年河北闹水灾，三千万亩农田遭到了水祸。中国的水利工作，至今还没有能够很大发展，再有十年之久可能解决。不过，我们在这方面对你们的援助，用不了等十年之久。

达：　去年你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援助，派了一万三千工人和技术员，这在工业和其他建设方面起了推动作

用。并且今年还给了无偿的一亿六千万卢布。因此，蒙古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

主席：不，不，上边已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数目是太少了，你们一提，我就觉得惭愧。

达： 集二线[5]对我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席：蒙古的农业现在怎样？

达： 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人力缺乏，很大一块土地至今还未开垦。

主席：这样不好，应该开荒。你们定居了吗？

达： 定居对我国农牧业发展，有很大好处，但现在还未定居下来。

主席：这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要逐步地办到，因为一个地方的草，是有限制的。我国有的省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定居下来，还可以种菜，种庄稼，这样人口才能增加。

达： 对！（指曾德说）他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任。您的这些建议，对我国将来的计划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主席：发展农业、牧畜业，首先要发展水利工作，这里包括水闸、蓄水库、水沟等工程。另一方面，牧草是很重要的，对你们来讲，“草就是油”。因此，你们应当培植牧草，应当采用深耕的方法，这样牧草就能长得又高又多，然后定居下来就有条件了。

达： 是的！我们重视您的这些谈话。

主席：你们可以早一些开始水利工程的准备工作。这方面

包括地质勘察工作、人力、物力等等，而财力还不算那么重要，最重要、最要紧的是人力。

你们应该先着手进行最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由乌兰巴托到西部国境，这一段路的中间，你们修了一条近代化的大马路，但很少用它。这是不很需要的。

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七年之久。在这以前，我们两国人民不大来往。虽然我国革命成功已有三十五年，但由于我国过去很落后，所以在这三十五年内未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虽然有成绩）。因此我国工农业可以说是没有很好地发展。

主席：你们应该自给自足。

达：　现在许多日用品都不能自己生产。

主席：这是不好的，应该扩大这方面的工业。

达：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影响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主席：你们还有多少军队？

达：　将近一师。

主席：这已够用了。现在，你们周围没有敌人。

达：　现在我们正在将这支部队的复员人员培养成为司机、建筑工人等。

主席：这是很好的。这是生产军！那么文字怎样呢？

达：　现在都用新（俄）文字，成年人都已识字了。

主席：很好，内蒙古也正在这样做。

达：　据说是那样。在文字方面，我们也可以帮助内蒙古。

主席：对，很需要这样。你们跟内蒙古有直接联系吗？

达：　现在没有直接联系呢！只是通过中央取得联系。

主席：不需要直接联系吗？

达：　需要直接联系，但未办正式手续。

主席：你们可以办的。你们可以到内蒙古建立自己的领事馆。这样做，用不了什么费用！你们从自己的大使馆抽出几个人来，就可以了。苏联也这样办的。在天津、上海、沈阳、广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领事馆。

不过，上述这些事，是我个人的说法，也许不正确，因为我未与政府、外交部负责人商量；同样，你们也是未与自己的政府商量过。但我认为，这些事情是能够实现的。

达：　谢谢！历史上的“债务”，我们连想也没想过。我们只是感谢你们。

主席：不！要还债的，这是我们在追还祖先们的债务。

主席：你们蒙古族是第三个民族。第一个民族是匈奴。它占了新疆、黄河北部的土地，有的已渡过了黄河。第二个民族是突厥，它占领了阿美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埃及、希腊等十几个民族，建立了大帝国。但这一民族后来被蒙古族打败了。因此，蒙古是第三个民族。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你们的祖先的来源。是不是在西伯利亚？

奥其尔巴特：噢！据说是那样！

主席：西伯利亚那里曾有一个高车族，据说他们都坐在高大的车子上。高车族是不是你们的祖先？

达：老人们都说，古代的祖先搬家时都用很高的车拉上所有的东西。

主席：你们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

达：关于十二世纪以前的记载，现在还没有，十三世纪以后的有些记载。这一方面的工作苏联帮助着我们。十三世纪以前的蒙古历史，跟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将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研究。

主席：很好，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事情。

达：我们的前途很宽广，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援助。今后，我们更要好好努力工作。

主席：应该好好发展。

达：我再一次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你们对我们的援助是兄弟般的伟大的援助。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债务”来看待。

主席：但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同任何国家都以平等共处，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不仅对你们这样，而且对国内少数民族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压迫了他们，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认错，就不能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实现民族平等。这是有根据的，这不是漂亮话。是不是？过去我们压迫过你们，但你们现在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给你

们的援助是小小的，这是在还债，不是援助。这样才能互相信赖。你们说是援助，这也好，你们这样说也表示平等。

达： 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我们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一切援助表示感谢！中蒙两国劳动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反动阶级所干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主席：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他们称王称霸。

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

达： 大多数的人都很好，少数人虽有时犯毛病，但那也不是有意识的。同时，谁都会有一些缺点的。

主席：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你们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站起来，教育他们。

达： 我们那里中国工人中有二百名党员，他们带领着其他工人很好地工作着。

主席：好！工人一共有多少？

达： 连家属一共一万三千人。过去的华侨一部分已回国，现在只剩下四五千人，但这些人都已年老了。

主席：蒙古人指挥他们吗？

曾德：是的！蒙古人以主人翁的态度指挥着他们。

主席：中国工人中有作木工活的吗？

达： 有。此外还有制砖的，以及其他各种行业。

主席：让他们带蒙古徒弟吗？

达：　他们分别地带着徒弟呢！

主席：以后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十万，也可以是二十万，甚至也可以达到三十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

达：　对，不过事先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工作。不然，接到那些人后，住宅等各方面要发生困难的。

主席：对！应该逐步地进行这些工作。你们有八十万人口，因此可以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了。

达：　我们有五万二千多工人。

主席：八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多工人，这数目不算小了。有使用机器的吗？

达：　使用着半自动机器。

主席：有没有自动化的？

达：　没有。

主席：那么将来可以装置一些。关于这一问题，将来我们互相可以谈一谈。

达：　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现在有了火柴厂、瓷器厂，但火柴厂所需要的火柴盒等都是用手工制作。

主席：火柴生产的数目多少？

达：　全国总共需要两千万盒火柴，明年生产可以达到这一数目。但在国内销路不太好。

主席：你们的市场怎样？

达：　市场，有是有，但很小。

主席：今天我们谈得很好。

达：　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感谢您对我们讲了很有益的话。我们回去后，把您今晚所讲的话，当做今后工作上的指针。当我们分手之际，我再一次代表我党中央和全体人民向您致衷心的敬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二　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外交部：

这个谈话，应抄送我驻蒙使馆，内蒙自治区党委，及各省、市、区党委阅看，因为各省市区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另抄给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以上请会同尚昆同志办理〔6〕。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达姆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3〕　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⑷　桑布，当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⑸　集二线，指内蒙古自治区的集宁至二连浩特的铁路。这条铁路北出国境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相接。

⑹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驻蒙古大使馆。

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尼协定[1]签订的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

值此中尼协定签订之际，承致祝贺，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国王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9月25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载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的命令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开始时致词，对阿查里雅首相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说：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毛泽东主席接着举杯祝尼泊尔国王陛下的身体健康，祝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阁下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访问的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在座的印度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团结一致，祝尼中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最近签订的协定[1]。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注　释

〔1〕　见本册第224页注〔1〕。

为鲁迅迁葬墓碑题词

（一九五六年）

鲁迅先生之墓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日）

总统阁下，印度尼西亚的贵宾们，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维护民族团结、逐步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着勇敢的斗争。苏加诺总统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和最近在欧美各国访问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同声赞扬的。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

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

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它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我建议大家举杯，

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

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为苏加诺总统的健康，干杯！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

总统阁下，朋友们，同志们：

在印度尼西亚建军十一周年这个重要的节日，我首先要向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祝贺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在争取实现印度尼西亚人民理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什么是印度尼西亚人的理想呢？苏加诺总统在最近对我们所作的几次重要的演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独立的理想、和平的理想、新世界的理想。这些也正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而且永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忠实的战友。

总统阁下，六天来，你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你的欢迎和敬爱。你的访问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明天，你就要离开北京，不久以后，你就要离开中国。虽然我们又将要相隔几千公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将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建议：

为我们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苏加诺阁下的健康，干杯！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为北京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

（一九五六年十月）

看了日本展览会⑴，觉得很好。祝贺日本人民的成功。

毛　泽　东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手稿）

注　释

⑴　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

给戴毓本[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毓本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敬祝

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以习梅[2]现在所处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检举。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戴毓本，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同学，曾在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医生。

〔2〕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当时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

对金日成关于志愿军赴朝参战六周年贺电的复电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同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参战六周年之际，承来电祝贺，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向你，并且通过你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通过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和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增进正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谨祝你们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　泽　东

1956年10月27日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
德·特·谢皮洛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以及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鼓舞了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1〕。这个宣言充分地表现了苏联忠于社会主义各国伟大

团结的共同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毫无疑问，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经济高涨。

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和合作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深知中苏两国的永恒友谊是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根本利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友谊将会极大地增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并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祝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永恒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11月6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⑴　指《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团结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法西斯主义被击溃后，它们在建立新制度和对社会关系进行深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有待以解决的任务和明显的错误，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关系原则被侵害的错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极坚决地指责这些侵害和错误，对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代表大会宣布，必须充分估计到走上建设新生活的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宣言还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关系以及对匈牙利事件所持的态度和原则，发表了声明。这一宣言，载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关于合作社养猪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一

请尚昆[2]办。

此文[3]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

二

即退陈云[4]同志：

在第五页和六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⑸，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时

三

少奇、陈云、小平⑹阅，此件⑺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毛 泽 东

十一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的《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后写的批语。这篇文章和批语（去掉抬头和第一句话）后来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本篇（二）写在陈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关于拟将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下发征求意见给邓小平的信上；本篇（三）写在国家计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报送的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省昆山县同心社养猪办法的报告上。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刊载的《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

⑷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⑸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第五页“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了“（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将第六页上“除大城市外，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一句，改为“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⑹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⑺　指国家计委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省昆山县同心社养猪办法的报告。报告说，这个社养猪的特点是：㈠由社里划出一定耕地来种菜作饲料。㈡每头猪只喂到毛重一百二十斤，每亩可养七头。㈢一年养两次，每头只养半年。这种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是值得提倡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这一报告。

纪念孙中山先生[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

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他曾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词："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同年，还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展览会题词："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

关于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各同志阅。退彭德怀[2]同志。

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王振乾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团结该军军长陈明仁一起工作问题给广州军区党委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谈了军党委常委在同陈明仁相处中存在的缺点，以及为团结他一起工作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通过相见以诚，多次找他个别恳谈和集体交换意见，并改进领导制度，从而增强了团结。陈明仁表示对他帮助很大，希望今后大家常谈心。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1956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四）1957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元，总预

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1957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的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1956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1957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

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　释

〔1〕　这个发言中的数字，经周恩来核对后，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退毛泽东，毛泽东在此稿上写了批语："即刻印发明天到会全体人员"。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他要求全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主义。他着重指出：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关于土特产品收购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

送陈云、李维汉[1]同志阅，退毛。

请陈云同志看建屏一条消息[2]，我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相当多的，应当统一加以处理。请维汉看武汉的一条消息[3]。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请李维汉同志电话询问武汉什么叫五统五不统[4]。并要你改善工作。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

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⑵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〇五七期上刊载的河北省建屏县贸易系统有些单位，在收购农民土特产品时压秤压价，非法营利，引起农民不满的消息。

⑶ 指同期《内部参考》刊载的武汉民主人士就匈牙利事件对我统战工作提出意见的消息。消息说，武汉民主人士希望中共从匈牙利事件中接受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统战工作，采取措施改变“五统五不统”的现象。

⑷ 这是当时武汉民主人士中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意见的一种说法。五统五不统，是指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统工商不统党派、统进步不统落后、统政治不统思想。

在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苏方邀请书似以在十二月中旬或下旬发出较为适宜。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是由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交的，当时周恩来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电报说：二十九日，尤金大使约见刘少奇时，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在访问阿富汗后能到莫斯科一谈，并问是否需要由苏方发出正式的邀请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由苏联正式邀请访问是必要的。你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以便中央再行考虑决定后，答复苏共中央。毛泽东审阅电报稿时，在末尾加写了这段话。

对《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1]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少奇、陈云[2]同志阅，退毛。

此件第一篇[3]关于章乃器的，值得一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章乃器，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3]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第二〇六八期刊登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文内说，不久前闭幕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对章乃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通过的《关于讨论当前几个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就是针对章乃器的错误论点的。这个决议已由新华社摘要报道（见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但章乃器的意见未公开发表。文内还简要介绍了章乃器的主要论点和有关情况。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那是长时期的思想改造问题。不单是工商界要这样，许多人都要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

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他还说：“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学习‘八大’文件是‘歌功颂德’，是‘礼多人不怪’”。“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了章乃器的上述错误论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否定或者不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消极的一面的想法和说法，在实际上必然会模糊当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从而使人忽略当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将足以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接受教育和改造，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

对邓子恢关于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

少奇、陈云、尚昆[2]阅，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

毛 泽 东

十二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福建省龙岩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说，中共龙岩县委最近召开了农业合作社社长会议，反映了合作社存在的以下问题。一、社员收入，各社多少不一。收入多的主要是搞好了副业，收入少的主要是靠种粮食。这种余粮社收入少的结果已引起农民重副业轻粮食生产。二、关于副业问题。社员分散搞副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除饲养家畜家禽、种菜及某些家庭手工业外，其他一般副业由社统一经营。三、公益金少留，无法解决困难户的困难，公益金不能少于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四、关于办社规模问题。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七百多个社合并到三百个左右，平均每社一百二十户左右。五、关于生产计划，区乡政府只按照上级交代任务往下分摊，并未征求各社意见，这样机械

地分配任务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六、贫农基金贷款太少，今春发下的双铧犁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不能用。七、干部配备上老农的比重过低。八、交通条件差，阻碍了山区生产的发展。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2]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

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

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3]，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根据手稿刊印。书信部分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两首词已编入《毛泽东诗词选》。

注　释

⑴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⑵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召开的中央常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同年十一月间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3〕 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一九五四年；《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泽东这一年夏天填的一首词。"今年"，指一九五六年；《水调歌头·长江》是这年六月填的一首词，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发表时，改题为《水调歌头·游泳》。词中的"逝者如斯乎"，在同年十二月十六日给黄炎培的信中，更正为"逝者如斯夫"，参见本册第268页；"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同年十二月五日抄录给周世钊时，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参见本册第258页。

给周世钊[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形情，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帐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2]，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长江[3]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会出国，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词部分已编入《毛泽东诗词选》。

注　释

⑴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⑵　指周世钊一九五〇年九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所作的《过许昌》一诗。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⑶　《水调歌头·长江》一首词，毛泽东写于一九五六年六月。词中的"逝者如斯乎"，在同年十二月十六日给黄炎培的信中，更正为"逝者如斯夫"，参见本册第268页。这首词的题目，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发表时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给 贺 果[1] 的 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贺果兄：

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形情，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

问你好！

弟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

对浙江执行侨务政策情况报道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罗瑞卿[1]同志：

111 页上关于浙江省的一条消息[2]值得一看。

毛　泽　东

十二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2〕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二〇七一期刊登的《浙江省许多地区在执行侨务政策中存在不少严重缺点》。文内说，出席浙江省最近召开的侨眷、归侨代表会议的代表反映，浙江各地（特别是农村）在对待侨眷和归侨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不少青年由于亲属在国外不能入团，甚至入工会也受阻碍；国外来信被拆阅以至传阅；干涉侨汇使用，强迫借贷、捐款和购买公债；一些公安部门对归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出国多方限制、留难。代表们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下面执行得不好，要求大力开展对侨务政策的宣传，重视贯彻侨务政策的问题。

给杨开智[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2]及阖家安吉！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给毛春秀[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春秀同志：

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

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毛春秀，毛泽东的姑母。

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退彭德怀[2]同志：

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你在今年夏季说过两次，军事系统各部，也要照政府各部一样，系统地向中央汇报一次工作。我认为这不仅对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的同志了解国防建设是必要的，同时对于军事系统各部、各军种、兵种的同志也是一次很大的鼓励。因八大前后事情很忙，这项工作未能进行，可否在明年一月初旬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进行汇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对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稿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

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2]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3]，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二

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徐冰、洛甫、

汉夫〔4〕阅。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西藏工委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电告中央，西藏拉萨等地可能发生暴乱。中央统战部于十五日为中央代拟了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对策问题的复电。这份电报原只发给西藏工委，毛泽东审阅时在电头加写了“并发驻缅甸大使馆转周总理，另发驻印度大使馆知悉”等文字。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复电稿集中修改的一段，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条。

〔4〕　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1]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南京军区党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关于进一步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军委、总政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上还存在着某些不够协调的情况。例如，有些部队对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地方全面工作照顾、配合不够，向地方提出的有些要求偏高偏急，而有些地方工作同志因对部队情况缺乏了解，对其特点和需要也照顾不够，等等。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报告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项工作。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前信[2]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赠吴湖帆先生、张叔通先生[3]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给黄炎培的信。见本册第255—256页。

〔3〕　吴湖帆，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张叔通，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江苏省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参见本册第209页注〔3〕。

给 杨 开 英[1] 的 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2]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3]及杨子珍夫妇[4]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杨开英，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

〔2〕　毛世美，现名毛臻，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3〕　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4〕　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字子珍）和他的夫人李崇德。

对邓子恢[1]关于撤区并乡试验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震林、尚昆[2]同志：

此件[3]请书记处加以讨论，如大家赞成的话，则转发各地仿办[4]。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邓子恢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关于福建省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给邓小平转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月龙岩县委并区并乡时将白土区撤销，合并于附城区（五个小区合成的大区），将原属七个乡并为三个乡，将原来乡干部中较强的调到县区工作。结果，乡的范围扩大了，任务加重了，干部的力量却削弱了，乡干部成天忙于日常事务，不能深入下层。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十一月在白土进行撤区并乡试验，将三个乡并为一个乡，将原来

区里的主要干部调回去，并将原三个乡的干部十二人合并，名称叫乡，实际上是区，干部相当强，可以独立工作。改编之后一般反映较好，有利于减少层次，发挥乡的积极性，加强乡的领导。

〔4〕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的经验是好的。可供各地参考。但目前对全国撤区并乡问题还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自行决定撤区（或撤销全部、或撤销大部分、或撤销一部分）或不撤区，并乡或不并乡，以及何时撤区并乡。凡撤区并乡的地方，应根据乡的范围大小，配备较强的干部，并注意总结经验。

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

陆定一[2]同志：

天主教事现在是否仍归你管理？上海的天主教工作值得加以研究，将那里的有关管理和接触天主教的干部和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善于做工作。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条[3]可以一阅。

阅后退毛。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内部刊物的封面上。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 指这期刊物刊载的《上海市卢湾区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情况》这条消息。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此件送陈叔通先生一阅[2]，退还陈云副总理。

我在这里[3]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关于遵陈云之嘱将同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送给毛泽东阅看的报告上。

[2]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看了毛泽东这一批语后，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写了以下一段话：各报均如此登载，我们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亦是照此传达，只是未曾再加一句：即是走上高级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

不是国有化。因此，有些人不懂基本两字，懂的亦不免怀疑，说三年结果去冬今春已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再两年即转变为国有化。这次毛主席说明定息七年还可能拖一个尾巴，大家就安心了。陈云将陈叔通写的这一段话报送毛泽东。

〔3〕“这里”，指高智送阅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参见本册第22页。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

在中央指示[1]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2]同志再阅，交尚昆[3]办。

二

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转各地委、市委、县委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一指示稿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

⑵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2]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入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转发了广东省委的这一报告。

〔2〕 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见本书第五册第234—260页。

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

刘、朱、陈、闻天[2]阅，退彭[3]。

二

筹划的两项[4]，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七日埃及大使来访，声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虽然部队损失不大，但军事装备损失很多。现在英法军队虽然被迫撤退，但战争危

险并未消失。为了坚持长期的斗争，埃军总部希望知道中国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援以外，在军事装备方面能够给予何种援助及其条件。我当即说明我国军事装备生产的情况，并告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至于条件则可商量，通过协议的方式、贷款的方式或无偿援助的方式均可，这主要看埃及方面觉得哪种方式合适即采取哪种方式。

⑵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闻天，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⑶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⑷ 指彭德怀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作好准备。二、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

给周世钊[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2]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3]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顺祝

平安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⑴　周世钊，又名东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⑵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⑶　曹子谷，即曹籽谷，解放前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一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二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

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三

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

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

根据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在起草过程中作过多次修改。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审阅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较多修改的四段文字，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此外，在第六稿第一页上论述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对立问题的一段文字旁边，毛泽东写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应〔在〕全文末尾写一小段"的批语。后来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在第四节末尾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在第六稿第九页上，他还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在旁边写了"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的批语。

关于登载高士文章[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

退陆定一[2]同志：

此件[3]看过。高士文章也看过，可以登世界知识。我已〔转〕胡乔木、田家英[4]二同〔志〕一阅，大概不久就可以退还你了。

毛　泽　东

一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阿约艾·高士写的《论印度的发展道路》一文。一九五六年，苏联《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二期先后发表了经济学博士摩德斯特·鲁宾斯坦的《论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再论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两篇论文，在印度等许多国家中引起了各种反响。这两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在印度制止垄断资本继续生长，通过和平方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高士认为，这不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他在印度《新世纪》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十期上发表这篇文章批评鲁宾斯坦的观点。《世界知识》一九五七年第二期转载了鲁宾斯坦的第一篇文章和高士的文章。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⑶　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加拉赫和阿诺德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问题的意见。他们说，目前的英译本不能令人满意，译本和原著的重要性不相称，毛泽东出色的文体也未能得到体现。建议本着信、达、雅的原则，组织精通中、英文和具有将作者的特性翻译过来的特殊才能的人对这一译本进行修订。

⑷　胡乔木、田家英，当时均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印发江苏省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

请尚昆⑴注意，待省市委书记到京时将此件⑵印发给他们。

毛

此件请乔木⑶看一下，退尚昆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⑵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转发的江苏省委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部署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省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相当严重，铺张浪费现象也较过去有了发展。突出的表现是，机构极为庞大，结果造成会议多、文件多、刊物多、长途电话多、管理和服务人员多，相互之间扯皮也多。致使领导人员高高在上，不能深入基层，处理问题，层层批转，迟迟不能解决。对下面的工作，则管得多，管得死，影响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必须精简机构，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报告对江苏省的增产节约运动作了全面部署：一、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的宣传教育。二、基本建设和各种经费开支不再增加新的项目，冻结

现有机构和人员编制。三、调查研究，制定整编方案，省级机关先行一步。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的这一报告时指出：现有编制应冻结起来，任何机关目前不得增设机构，吸收新人员，在没有找到妥善安置办法以前，不要把精简人员从现在工作岗位上减出去。这两点请各地特别注意。

〔3〕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意见[1]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

一

增加一条，这是在中央会议上谈过的，并已向陈叔通、荣毅仁[2]及各省市资本家代表宣布过。

毛　泽　东

一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问题，不但应吸收那些自愿参加的资方人员参加，而且应和工商联及民建会协商，取得他们同意，方可进行。对于资方人员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在结案时也要有工商联民建会参加审查，得其同意，方可结案。各省市目前是否在私方人员中进行肃反，由各省市自己决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一九五七年肃反规划的批语稿时，对增写一条所作的说明；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批语稿中增写的第三条。

⑵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荣毅仁，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

定一[1]同志：

国际问题文章[2]内容和文字均无弊病，可以不要修改了。

毛　泽　东

一月五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人民日报》社论稿《评艾森豪威尔主义》，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

邀请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敬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热烈地邀请你，敬爱的主席同志来我国进行访问。我深信，你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如你同意，请将你认为合适的访问日期〔1〕，通知我们。我和全中国的人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你的光临。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月6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信中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请。如果对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问兄弟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发《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

尚昆[1]同志：

请将此文[2]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3]各同志。

毛　泽　东

一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

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提出了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对此作了自我批评。

〔3〕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给臧克家[1]的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有手稿）

注　释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为刘胡兰[1]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2]

（一九五七年）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

根据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注　释

[1]　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人。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被捕，英勇就义。生前曾任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区妇救会干事。

[2]　一九四七年三月，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的事迹后，曾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这一题词后来在战争中丢失。一九五七年为纪念刘胡兰牺牲十周年，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毛泽东为陵园重写了这一题词。

为洞头岛烈士墓[1]纪念碑题词

（一九五七年）

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根据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洞头岛烈士墓建于浙江省东南瓯江口外洞头岛北岱山麓。这座公墓安葬了一百三十二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烈士，他们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多次保卫洞头岛一带人民的战斗中牺牲的。

在公安部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

不但这些人〔1〕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

毛　泽　东

二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公安部党组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刘焕东等十二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考虑到他们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对邓子恢[1]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4]处理。

毛　泽　东

二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力枢纽，它的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千年洪水灾害，保证黄河不改道，使冀、鲁、豫、苏、皖五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二月开工，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汛期内部分蓄洪。

　　〔4〕　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

任之先生：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2]为宜。顺致

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六月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句。毛泽东曾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将这首词录赠黄炎培。参见本册第256页。

对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退胡乔木[2]同志。

此件[3]可用。请用中央名义写一电报，请中央各部委及党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于收到此件后，迅即转发县委，城市的区委和军队的团委，并在党刊上登载。

毛　泽　东

二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一月三十日修正稿）上。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稿时，将括号内“一月三十日修正稿”几个字改为“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政治局通过”，移至题下。这个指示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印发。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指《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迅速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这一年经济建设的年度计划也有进展

过快的缺点，并且在计划执行的某些方面放松了应有的控制。首先，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过高，摆的摊子过多，使一九五六年物资的供需之间和现金的收支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平衡的现象。其次，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其结果不但使企业的工资开支和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过多，而且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城市人口增加过快，城市建筑的需要也增加过快。第三，由于过多地增加了职工，过多地扩大了职工工资的升级面，不适当地支付了一部分福利费用和奖金，一部分人员的工资也增加过多，使得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大大超过了消费物资的增长，造成了市场上特别是城市中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此外，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没有能够完成，对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消费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以及财政的收入，也有不利的影响。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一九五六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调整，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1]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寄来读者抄录的说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庆贺彭德怀率兵攻取腊子口写的一份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们请毛泽东校阅并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毛泽东看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了这封回信。由于事隔二十多年，加之来信把写诗的地点、背景弄错了，毛泽东回忆不起这首诗来，未同意发表。据彭德怀回忆，这首诗是毛泽东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写给他的，他把诗的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见《彭德怀自述》第206—207页）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五七年《解放军文艺》四月号上。一九八六年九月收入《毛泽东诗词选》副编。

对日本战犯榊原秀夫亲属来信[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请周[2]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

毛　泽　东

二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日本战犯榊原秀夫的女儿榊原公子、榊原贵子和妻子榊原房子一九五六年底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报道，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视察团时曾说："战犯榊原如果有病的话，可以考虑释放。"榊原过去在国家战争政策的压力下，进行了细菌研究，的确是一个犯了罪恶的人。但作为他的亲人，是没有一天不在祈望着他的健康和自由的。今得知榊原旧病暂时痊愈，又患了咳血症，恳请毛主席先生宽宥他，让他回国治疗。来信并表示：为了向中国的许多牺牲者表示哀悼之意，一定要尽全力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活动。

〔2〕　周，指周恩来。

关于调查河北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此件[1]寄河北省委马国瑞[2]同志：

此件所说是否属实，原因何在，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二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莫余平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生产情况的调查与整社意见的报告。莫余平，任冶金工业部金属回收管理局副局长，当时正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这个报告是他利用寒假回乡探亲时写的。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一九五六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一九五六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主要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强行盲目推广新技术；耕作粗糙，荒地不少；收割时随便把粮食丢在地里糟塌了；副业生产搞得不好。报告还反映了社员对社领导和党支部的意见，说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

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发展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

〔2〕　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对彭德怀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同意。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

毛　泽　东

二月廿五日

大量裁兵，一定要有出路，不能推出了事。要作至少一个月还乡态度、策略教育，设想各种困难，作好精神准备。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拟于二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与陈赓、谭政、陈士榘等十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以及了解军事院校工作、军队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问题。

对军委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军委：

上半年忙，下半年为妥。不要都准备，有四总、空、海即够，看情形酌定。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军委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军事系统各部门、各军种、兵种向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军委经过讨论，初步预定：按总参、总政、总干、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的次序，依次汇报，最好都能分别汇报一次，以使政治局同志多了解一些军队工作情况，多给些指示。但是否每个部门都一一汇报，或只抽其中几个重要部门和军种、兵种汇报，请指示。汇报时间可在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中旬以前。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1]

（一九五七年二月）

（一） 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首先，分清敌我，分清是非。

人民日报的文章[2]，说的是国际方面。

专政制与民主集中制。

大民主与小民主。

早一点取消专政吗？

制〈专〉政所适用的范围。

民主是目的吗？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具体的的自由。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

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哪一类？

新问题：马恩，列，斯大林。

本来容易混淆：右的——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左”的——过分强调敌我，又将第二类误为第一类。

1942年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后来

推广于党外，逐步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1956年五月十大关系。

(二) 肃反

比较起来，我国做得最好，比苏联，比匈牙利。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过火与漏斗都有。

群众肃反与公安部肃反。

今年和明年应来一次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是否应当大赦？

(三) 社会主义改造—— 合作化

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吗？

应支持农民，反对歪风。

争取五年内巩固合作社，接近或达到富裕中农水平，习惯于集体生活。

生活已有改善—— 七年增产1400亿斤，平均60元。

还有百分之几到十几的缺粮户，有的地方已无缺粮户。

几年内不增加征购量，逐步取消农村统销，粮、肉、油自给（一般）。

(四) 资本主义改造

也有一股风，说是资本家不改造了，工人也有两重性。

工人、资本家已经一样了吗？

(五)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有很大进步，也有歪风——波动，怪议论，想杀人，想学匈牙利，要大自由，讨厌马克思主义，只钻业务赚薪水。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改造自己。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四年来，歪风又发展了。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是战略方针——例如：救灾、统销、安排工商就业、统战安排等。

从六亿人口出发，节育。

去年就业近三百万。

广州、上海等处还有一些人失业。

百分之四十、四百万、八十万、九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两方面的斗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老干部不能批评鸣吗？

新老干部的关系：一视同仁，又不能一视同仁，领导核心。

种牛痘。

北京不能批吗？

钟惦棐、陈沂、陈其通、马寒冰[3]。

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

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从存在出发：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期耐心的教育。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⑷？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这是一个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需解放全人类”，“在阶级斗争中，改造剥削者，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治病救人。

统一战线，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联系起来。

㈨ 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㈩ 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

罢工、罢课、游行、请愿、闹事的二重性。

匈牙利事件⑸的二重性。

批判斯大林事件的二重性。

反苏反共事件的二重性。

生人死人的二重性。

美国不承认我们的二重性。

出现几篇错误文章的二重性。

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

物极必反，不及则不及〈反〉。

中国人穷与愚（不识字）的二重性。

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

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也有二重性。

国际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向坏处着想，打大战，怎么办？打败仗怎么办？打败仗就是打胜仗。

目前一个长时间内还不会，可能有十几年，可能更长。

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互争殖民地，互争亚非。

（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

（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

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

重、轻、农的比例是否可以是六比一？重工业还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二十一年内增加1400万吨钢）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如果给我们二十一年（从1950—1970），是否可以基本上工业化，而不止1800万吨钢（由90万吨开始）？

这个问题我们还缺少经验，总之要有广大市场，要看六亿至八亿人口。

还是要学习苏联。苏联不好吗？别国也要学，但谁给装备和技术呢？

十大关系：

（一）重与轻、农关系

（二）沿海与内地关系

（三）经济与国防关系

⑷ 国家与生产单位（工厂、合作社）与个人关系

⑸ 中央与地方关系

⑹ 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⑺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关系（长期共存）

⑻ 敌我关系

⑼ 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⑽ 中国与外国关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写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提纲，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来在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上，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⑵ 指《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登载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登载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⑶ 钟惦棐，当时任《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文艺报》第二十三号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陈沂，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其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马寒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部陈亚丁、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

⑷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

⑸ 指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的政治事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

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

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

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⑵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

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

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

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 批评—— 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 批评—— 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

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

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

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

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

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

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

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

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3]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

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

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

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

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

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

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4〕，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

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

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

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

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

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㈢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㈣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㈤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

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

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

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㈠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

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

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 时 的 ，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 于 节 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

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

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

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原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篇讲话记录整理成文后，于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日报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中旬，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并多次征求党内领导同志的意见。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改稿上，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修改和征求意见中，毛泽东还写了不少批语，现将比较重要的作一介绍。五月十日，他批示将几经修改后的稿子作为“草稿第一稿”在小范围内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印小型12份，大

型三份，连原稿送来。版留。”“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毛泽东　五月十日”。五月二十四日，他批示将“第二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再打清样（大本），即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五月二十五日，他批示将“第三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田家英同志：即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今天到会各省市区负责同志（卅余人），务于今日晚十二时以前送到各人手里，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毛　即”。“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七日，他批示将“第四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田家英同志：请再印，印数如此次到会人数，于今天晚上九时以前发到到会各人手里。改处校正勿误。毛泽东　五月廿七日”。“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八日，他批示将“第五稿”印发征求意见，写的批语是：“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每省（市、自治区）一份，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每人一份，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各一份。将以前几次所发各稿全部收回。原稿退毛”。“各位同志：这是第五稿。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他自己标明的“六月八日修正稿”上批示：“即打清样35

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毛泽东　六月九日上午二时”。这个讲话整理稿，经毛泽东审定，于六月十七日最后定稿。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

〔2〕　指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的政治事件。

〔3〕　指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以王国藩为社长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4〕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两年至三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遵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了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1]，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橡胶。

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50—60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加〈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2]，蒋介石选集[3]。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

⑵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说，《参考消息》的发行，准备由二千份扩充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

⑶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说他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但不公开发行。

关于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四月六日）

一

尚昆[2]同志：

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三月四日

二

尚昆同志：

160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150斤计算，共有450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用户，实际上有

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请酌办。

毛　泽　东

四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内部参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一三九期刊载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的消息后写的批语。消息说，据《大公报》通讯员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规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费很大的力气，经过严格的挑选，才能符合标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新华社派记者对此事作了调查，并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第二一七〇期刊载了《关于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有严重浪费现象的调查》。这篇调查说，《大公报》通讯员所反映的情况，经记者复查，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不够全面，并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六十口，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百分之五，其中只有三口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一六〇户），不足全市特种供应量的百分之五。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毛泽东看了这篇调查后写了第二个批语，即本篇（二）。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班禅额尔德尼[1]的复电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从印度回到日喀则时给我拍来的电报和火鸡年[2]元旦给我的贺电，我都收到了，谢谢你的祝贺。

这次你和达赖喇嘛[3]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4]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会，在加强中印友谊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祝你在新的一年内在西藏地区各项工作上取得新的成就，祝你身体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2〕　火鸡年，藏历纪年。藏历采用干支纪年，以"阴阳"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代替十干，以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代替十二支，再以十干和十二支相配成，如阳木鼠年、阴木牛年等。以此计算，一九五七年是藏历阴火鸡年，也

称火鸡年。

⑶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⑷　释迦牟尼，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

关于同意甘孜藏族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刘、周、朱、彭真⑴阅，退小平⑵（或尚昆⑶）办。我认为应当同意这个方针⑷。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⑵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⑷　指中共四川省委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继续进行和完成改革的方针。报告说，甘孜藏族自治州除牧区、农牧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和早已完成合作化的泸定县（汉族）外，农业区（约三十二万人）的民主改革，十四万人的地区已经完成，其他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继续进行。省委认为，这样做符合整个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理由是：1．有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保护和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大量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2. 坚持改下去，将会教育藏族上层，认清前途，消除顾虑；3. 完成改革的地区，对寺庙迅速实行包起来的政策，给以长期维持，有利于社会治安和生产发展；4. 可以巩固公路交通，利于进藏物资的运输；5. 坚决完成这一地区的改革，必将促进整个藏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增进民族团结，也可减少云南后顾之忧；6. 如果不坚持改下去，势必伤害干部，加深群众痛苦，助长上层右倾，甚至造成更加混乱局面，脱离群众，前功尽弃。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1]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一

退小平[2]办。略有修改[3]。

毛　泽　东

三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

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处理。

三

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一般说来，这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

这种方式，一般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的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在学校方面，切实保证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和党的支部会议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随时征求他们的意见。（三）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还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要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教育，使群众懂得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指示对闹事问题的处置作了一些要求和规定。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见本篇（二）（三）。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这一指示的修正稿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三）是他为指示修正稿加写的第五点。这一指示正式印发前，中央还作过一些文字修改。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1]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在这次会上不能将一切问题都解决，只能提起一个纲领和解决某些问题。

（一）新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存在决定意识，各种不同意见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是基本上健康的，须要几年才能巩固，从此将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工业国。

（二）我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除了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会失败、希望回复到资本主义时代去的以外，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有许多人对于在新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答，不大清楚，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还有怀疑，他们抱有各种错误观点。在 500 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约有 10%左右是比较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另有大约百分之几的人是反对或者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还不多，但是愿意研究它。我们的任务，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争取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内，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

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通过实践懂得较多的马克思主义。

㈢ 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一面教，一面学。

㈣ 整风

先在党内整，党外自愿参加，批判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

㈤ 为人民服务，工农兵方向

下厂下乡，调查研究，交朋友。

任何知识分子，不同工农打成一片，不知工厂、农村情形，要指导工农事业，是不可能的。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

我们希望有70%的人下去，另有30%的人不能或者不愿下去，也就可以了。

要造成风气。延安曾做过，很有效果。不然，单在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有共同语言，很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作品还是写不好。科学家有实验室，工厂农村是一切知识分子的大实验室。

㈥ 两种片面性

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都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判。

工作中，文章中，不可能不带片面性，但是我们应当要求：辩证法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地少一些。

"是否能领〔导〕科学"，只要能领导阶级斗争，就能〔领导〕向自然的斗争，会有大批的科学家加进党里来。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

"杂文一定有片面性"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通的人讲的话，列宁和鲁迅就没有片面性。

"不敢写文章"。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并且我国的环境也不算太坏。是文章的好坏问题，真正的好文章，会受读者欢迎。

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应当能写敢写。

（七）"放"，还是"收"

"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

真、美、善、香与伪、丑、恶的对立统一，前者才能分辨，才能发展，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为例。

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

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⑵的批评问题。

电影事业应当进行彻底改革问题。

（八）希望地方召开有党员与非党员都参加的会议，将

会议中提出的问题继续讨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写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的提纲，题为《在宣传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在北京召开，出席的有党内外思想文化工作者八百人左右。

⑵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

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

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

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教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

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一下子大家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

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

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

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

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

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

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

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

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

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继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于同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记录整理成文后，于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日报送毛泽东。同年六月，毛泽东对这篇讲话整理稿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并曾批示将稿子印送中央领导同志及其他有关的同志征求意见，批语是："即刻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胡绳、陈正人。另发翻译十二份。""各同志：此件请即看一下，于你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在六月廿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退还陈伯达同志，为盼！毛泽东　六月十八日。"这篇讲话整理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一九六四年，这篇讲话准备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又作了修改。三月十四日，在稿子上他写了如下批语："请康生、伯达二同志看一看，提出意见，或者直接在文本上加以修改。这是一篇老的讲话，没有发表过。田家英同志说要印进一个新的简选本里去，也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印？"不久，这篇讲话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后来，又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对《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毛 泽 东

三月十六日四时

我今天乘车去天津，明天去济南。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我国大约有五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最大部分的人，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

起来。现在，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指示还肯定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经验，要求各省市召开同样的宣传工作会议，吸收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的党外人士参加，充分发扬民主，让他们讲出内心的话。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毛泽东审阅这一指示稿时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如将指示稿中“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句，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1]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

（一九五七年三月）

一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

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

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⑵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

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

（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

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

公开承认矛盾，列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林〈斯〉大林不承认，混淆两类问题，直到死前才在理论上承认，但实际做又是一件事。

（二）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

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妨〈防〉止，但不要夸大。

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

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

六亿和500万——左、中、右。

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150万人

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使中间派进一步。

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放还是收？

说还是压？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四人文章）[2]。

会不会乱？

会不会被批倒？

毒素怎么办？

（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

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

争取70%下厂下乡。

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

（六）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它的发展史。谁怕批评？阿Q。

党内党外，并和党外一起。

要使用党外。

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要艰苦奋斗（调整工资）（革命意志衰退）（争名夺利）（白手成家）。

要养成学习习惯。

原则性与灵活性（闹事，毒素有好处）。

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

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

谁怕批评？共、国、民主党派。

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

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写的一篇讲话提纲，他自拟的题目是“讲话”。按照这个提纲，毛泽东于同年三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

〔2〕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载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1]

（一九五七年三月）

有一半对

一、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而治”。有的科学家想挑比较容易取得个人成就的工作做，不愿意切实地为国家需要服务。党应当怎样来领导科学工作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还存在着阻碍。一方面有些党员负责干部把最近一个时期科学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都算在“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的帐上。（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许多思想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也是原因，例如“副博士”问题，闹了已将近一年，但有关部门还没有认真研究过。在我们的国家条件下，学位制度到底应该怎样来

设立，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副博士必读书目和学位论文写法之类的流行，更助长了教条主义的风气〕。另一方面，党外科学家中间的宗派主义也还没有彻底解决。

他们是有些理由的

三、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就拿不出什么科学成果，因此“百家争鸣”对他们的实惠不大。这个看法在社会科学〔家〕中有〔特别是经济学家认为得不到调查统计资料，不能切实地做研究工作〕，而在自然科学家〔中〕更为显著一些。他们对“工作条件”的兴趣，比对“百家争鸣”的兴趣高。纸张供应紧张后，关心科学成果能不能发表的人就更多。现在我们没有一套发表和评定科学成果的健全的制度，对贯彻百家争鸣也是一个不小的阻碍。

应当弄清这种关系

四、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同时关于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不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有各不相同的议论。有人认为科学界已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

戒律太多

应允许争鸣。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百家

争鸣”与“学风”问题。

五、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性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文学界、法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要不要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问题也已经提出。目前在社会科学中几个理论性最强的方面（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中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也未解决。

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

六、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在一些同志中间看法不一致。对这种状况，应该怎样估计？

七、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缺点，应当注意什么原则，如何掌握分寸？

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

八、目前有些作家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因此，“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感受即真实”，至于作品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作家用不着考虑。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与思想性的关系，应该怎样看？

九、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在文艺界看法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文学既然是反映

现实，只要现实主义就够了，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然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些人认为作家反映现实离不开他的立场观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他的现实主义就不同于过去的现实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的现实主义是有性质上的区别的，它不应该被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

同上

十、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文艺批评工作？

十一、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去年八月，在中央批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方案中，有这样的指示：“除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特别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在这个问题上的了解不同，并且有些误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的党委对和党的政策不相同的意见主张少发表或不发表，要有掌握。而

报刊方面受到读者、作者的冲击力很大，主张多发表一些。

有些报刊发表了关于讨论某些国家工作的文章，还发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有的报纸发表了关于"劳卫制"问题的文章，讨论"劳卫制"在中国适合不适合，很多学生受了讨论的影响，就不愿参加"劳卫制"了，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就不赞成在报刊上进行这种讨论。诸如此类问题很多。

同前

十二、同上述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

中央政府各部有些措施不当，在没有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妥以前，地方报纸能否批评？

十三、有人说："报纸是宣传工具，但它也是商品"，"不把它当作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这种言论引起了报界的注意。在讨论中，有些人否认报纸是党教育人民的工具，否认党的领导。例如，有的编辑说："报纸应有权力，不应跟在党委屁股后面走"；"心目中一有领导，版面就编不好，心目中有了读者，报纸就编得好。"还有人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说："在野报"、"民间报"可以"大胆敢言，切中时弊，讲人民要讲的话。"不少党内办报的人也提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应该

同前

如何统一？如何理解？

十四、有人指出党校是有特殊性的，即学员都是党员，因此，这里的"争鸣"，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有人说，"党校中不能给唯心主义设'讲坛'"。有人说，党校已经有一个方针了（即"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怎么又来一个"百家争鸣"，究竟是一条方针，还是两条方针？有人说，"'百家争鸣'的精神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所以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包括在党校的原有方针中了，在党校中何必另外强调百家争鸣？

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十五、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学习经典著作有无矛盾呢？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

不许怀疑吗？

十六、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有人说，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的政策是可以在党的会议和刊物上讨论的，怀疑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争论，有人说，党员争论党的政策只限于

为什么不允争论呢？

对政策的不同的理解和执行方法问题，如果有反对或者怀疑党的政策的意见，是不允许争论的。

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十七、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例如有人入党后仍然相信凯因斯学说，如何办？）

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十八、如何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

目前许多理论课程教员，埋头准备讲稿，照念讲稿，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学习党的重要文献，不研究现状。

应当改变

十九、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独立思考"、"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等口号提出后，高等学校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干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放弃领导，对群众的错误思想行为不进行教育批评，以致产生若干混乱现象；一种是在党的这一重大的方针政策面前，迟疑观望，甚至有抵触情绪，对各方面的工作不敢放手，群众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积极性未能很好地发挥。因此，在教育方面如何正确执行这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仍旧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两者都不对

二十、针对少数中等专业学校和个别高等学校中发生过的罢课、请愿事件的情况，今后应该如何对广大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此点值得重新研究

廿一、党章规定，学校党组织具有领导和监督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职能以后，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

都是不对的

廿二、自从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高等学校教师偏重于搞科学研究工作，不愿多作教学工作，从而发生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同时，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多希望作科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不安心政治工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相当严重。

都是不对的

廿三、过去学校对于学生管理得死死的。自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和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以来（还有外国的影响），已开始表现出另外一个偏向，学生强调自由、民主、个人专长的发展，不遵守学校纪律，对教师不礼貌，缺乏艰苦耐劳的思想；而在学校和教师方

前者是错误的，后者应当改革

面，则变得束手束脚，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

廿四、有些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当局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有单纯搞业务的现象。还有学校课程多，教材分量一般较重，因此，形成学生的负担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有人说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在别的方面。

廿五、提出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学方针以来，许多人积极参加讨论，截止目前，仍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全面发展是完整的方针，不需要加因材施教；一种认为需要加因材施教。目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前一种意见，多属教育领导部门和某些教育机关人员的意见，后一种主要是下级教育领导部门和学校干部的意见。在这个方针的讨论中，也表现出，一种人对过去教育上的成绩肯定的太多了一些，只承认有很小的缺点；另一种则似乎对教育成绩又否定得多了一些，而对缺点则看得多了一些。

廿六、前一时期卫生部把中医政策概括为'先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加以整理提高'十七个字下达，在医学界中引起了一些误解，有人觉得贯彻中医政策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矛盾，也有些西医在学习中医问题

上不服气。另一方面，在中医工作的领导思想上，也存在着拒绝一切不同意见的毛病。

廿七、卫生系统应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卫生行政部门怎样抓政治思想问题，各级党委怎样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医院党组织的任务是否应该与学校、企业、工厂相同 （即实现党的领导与监督）？

廿八、目前，对农村矛盾的分析有些混乱。有的说："当前主要矛盾是新、旧思想矛盾"；有的认为是"经营管理的矛盾"；有的说："主要是富裕中农斗争"；有的则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已是残余的了"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残余的了"。应该怎样才全面？

是一个东西

廿九、目前，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区别得不清楚，有时叫这样，有时又叫那样，怎样划分这个界限？

卅、目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几类，什么是当前主要矛盾？

卅一、目前主要应反对哪几种官僚主义？目前有些地方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划不清界限，如认为领导上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即是官僚主义。

卅二、过去各业务部门下达任务时，只

规定生产任务、指标、上缴利润等，今后是否可以规定政治任务？如何解决业务挤掉政治的矛盾？各业务部门如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业务部门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如何协调？

卅三、目前在文教单位做党委工作的干部能力弱，水平低。另据有的省委负责同志反映，目前有人强调校长制，对党委制有抵触。在文教系统中如何健全党委制？

根据毛泽东批注件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同志参考的，共编入了三十三个问题。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二十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
伊斯特万·道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
亚诺什·卡达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伊姆雷·霍瓦特同志：

当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二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方面作了重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就。不久以前，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伟大的苏联真诚无私的援助之下，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匈牙利人民的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团结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民主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挠英勇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决心。最近中匈和苏匈之间的会谈和取得的协议，进一步加强了中、苏、匈三国的团结和合作。我们谨祝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祝中匈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4月3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欢迎和感谢波兰政府代表团访华的讲话[1]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九日）

一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上致词，对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毛主席说，波兰是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的国家，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波两国之间的友谊一天天在增进。祝波兰一切都好，祝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团结，祝中波两国的友谊日益发展。

毛主席举杯祝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身体健康，祝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身体健康，祝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身体健康。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二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感谢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所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波兰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我们请波兰政府代表团把中国人民同样的友谊和最良好的祝愿带回给波兰人民。

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祝苏联、波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一起。

祝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更好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努力。

我请大家同我一起，

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的夫人，为波兰政府代表团其他同志们的健康，

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的健康，

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同志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欢迎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的新闻稿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在西伦凯维兹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对整风运动决定草案的批语和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稿

（一九五七年四月）

一

彭真[1]同志：

此件[2]请商周[3]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

毛　泽　东

四月九日

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各级党委和党组：

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行〈后〉正式施行。你们试行的时候，必须作出部署，并且根据地方特点发出省市一级的指示。然后在试行中密切注意随

时纠正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文件以能阅读者为限，不能阅读者以讲演代之。农村整风，由省市级另定办法。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⑷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⑵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原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准备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后下发。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在文内作了一些修改，并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后来，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⑶　周，指周恩来。

⑷　这是毛泽东起草通知时写的一个待定的日期的符号，原准备按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通知的时间填写，后来这个通知没有下发。

关于请胡乔木[1]阅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四月）

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2]。

毛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文章说，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第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我国的社会制度起了根本的变化。第二，经济制度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第三，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其他工作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它们应当而且也必然会有高度的发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里，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建设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当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给张维[1]暨夫人的信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张维同志暨张夫人：

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于北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1]

（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月）

一

敬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同志：

你这次来我国访问，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两国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你和随同你前来访问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为整个人类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榜样。中国人民正在苏联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下，沿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努力前进。

中苏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兄弟友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苏联人民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同情和支持，请允许我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席同志，你是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深信，你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并且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

中苏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二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同志，

亲爱的苏联同志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

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的身上看见自己解放和建设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战

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八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

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发展，

为世界的和平，

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

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

干杯！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三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亲爱的大使同志，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当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友好访问以后，我们又同他们欢聚在一起，感到特别亲切和愉快。

伏罗希洛夫主席以巨大的热情和不倦的精力，在将近二十天的时间内，访问了我国许多地方，同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人士作了亲切的会见，把苏联人民的兄弟感情转达给千百万的中国人民。这一切，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且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这些日子里，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中苏两国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和亲密无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团结和友谊，不仅是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有利因素，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重要部分，也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可靠保证。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一样，将继续尽一切力量，为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团结友好和合作关系而努力。

伏罗希洛夫主席不久就要结束他在中国的友好访问了。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并且衷心地请他把中国人民最诚挚的友情带给全体苏联人民。

让我们举杯：

为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的日益繁荣和富强，

为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为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
为世界和平，
为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健康和长寿，
干杯！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四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同志们、朋友们：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我国各地进行了二十多天亲切友好的访问以后，继续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的访问。现在他们就要离开我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我们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来欢送他们。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他带来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他同中国广大人民的热情会见，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深厚友谊。我们希望伏罗希洛夫同志把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最诚挚的友好愿望带给全体苏联人民。

伏罗希洛夫同志！当你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请允许我再一次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你，并且通过你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最大的感谢。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亲爱的主席同志！我祝你身体健康，一路平安，并且在增进苏联人民的繁荣幸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的欢迎词；本篇（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在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国宴上的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本篇（四）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伏罗希洛夫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的欢送词。此外，据新华社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报道，伏罗希洛夫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欢迎酒会上见到卫立煌，周恩来作了介绍，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

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　　央

1957年4月19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给 袁 水 拍[1] 的 信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2]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3]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4]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袁水拍，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

〔2〕 《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载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3〕 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载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⑷　李希凡，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一九五五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任编辑。

给达赖喇嘛[1]的复电和对复电稿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

一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

你同班禅额尔德尼[2]出国参加释迦牟尼[3]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二

分复为好。退徐冰办理。[4]

毛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 释迦牟尼，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

[4]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请示信上写的批语。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达赖喇嘛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徐冰在报送统战部代拟的给达赖喇嘛的复电时，曾建议用毛、刘、周、朱四个人的名义合发一份复电。

接受瑞士大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所递交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国书，并对您所转达的瑞士联邦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我个人的祝贺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一直对瑞士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瑞士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永久中立国家在维护和平方面所作的贡献。

值得欣慰的是，从1950年中、瑞建交以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已有了发展。我国驻贵国公使馆已于去年年初升格为大使馆。在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方面，诚如大使先生所说，也有了加强。大使先生，这些成就无疑同您在担任联邦驻我国公使期间所做努力是分不开的。现在贵国政府已将驻我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我相信这将使中、瑞间已存在的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瑞士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中、瑞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阁下在工作中继续获得成功，并祝贵国人民幸福和元首健康。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的修改和说明[1]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二

彭真、小平[2]再阅，尚昆[3]办。

必须把目的提出，因此加了几句话。

毛　泽　东

四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时加写的话。中央转发的文件有：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3.《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在检查工作中，应注意：（一）这次全面检查，主要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和是否依法办事的问题进行典型和重点检查，而不是对过去所有的案件一一复查。（二）全面检查的对象是犯人尚在关押、劳改、被管制中的案件，检查的重点是冤案和错案。由于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宽大的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绝不能用现在的量刑尺度衡量过去已经判决的案件，甚至改判过去的案件。（三）检查肃反工作一般应该由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司法机关进行，同时必须吸收被检查单位参加肃反斗争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但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单独地同被斗争的对象和别人谈话，或任何人要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单独谈话，均不得阻挠。（四）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检查好的典型，又要检查坏的和中等的典型，要介绍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也要介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以往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要批评，对违法乱纪行为应作适当的处理，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五）领导肃反运

动的十人小组，是领导群众进行肃清反革命运动的组织，任务是领导群众清查、检举反革命分子。它不是司法机关，不担负对犯人的逮捕、起诉、审判工作。批语还要求各级党委应当重视这次检查工作，切实领导和督促十人小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这一工作。各地对检查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应该随时报告中央，并于检查结束后，向中央做总结报告。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修改中央批语稿所作的说明。

⑵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接受保加利亚大使涅加尔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递交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您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保加利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和自由并且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人民，保加利亚人民是经过长期的反对外国压迫的英勇斗争而获得解放的。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十二年中，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保加利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和合作化农业的工业—— 农业国。保加利亚在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般的保加利亚人民的这些成就和贡献深为钦佩，并且感到欢欣鼓舞。

近年来，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深信，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上，这种友谊和合作必将日

益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和加强中保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乔木[2]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　泽　东

四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的报头上。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平恢复两年多以来，越南人民又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越南人民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定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诚如大使同志所说，很久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就在兄弟般的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中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和发展。我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根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1]，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2]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

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3〕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4〕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廿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2〕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3〕　指新华社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发的关于湖北省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条消息。消息说，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一、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二、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三、在占用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耕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四、地方干部与转业军人相处不好，发生纠纷。五、城镇中学政治空气薄弱、校风校纪不正，引起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对政府和学校领导严重不满。有些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引起学生闹事。六、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间的矛盾。

〔4〕　指中共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见本册第432—433页。

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陈云[2]同志：

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

毛　泽　东

四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关于我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上。报告说，目前，我驻苏人员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工作、学习也是积极的。但自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在相当一部分人员（主要是留学生）中，产生了一些偏激情绪。有不少学生失去了在苏联学习的信心，要求回国学习和实习的学生增多。报告指出，在留学生、实习生派遣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1）数量多，在苏联高教部系统的研究生中，我国高教部系统派出的研究生约占了三分之一，而且比较集中，因而导师和教研室都发生困难，有些留学生不得不改变原来所学的专业。（2）国内可以培养或并非苏联专长的

学科，也派人出国学习。⑶质量差，一些人员的专业基础、俄语水平、身体状况和思想作风不符合条件。⑷派遣机构不统一，不能控制，又不能调剂。针对这些问题，我驻苏使馆建议国务院应指定一定的机构统一掌握派遣工作，并应根据我国的需要及苏联的专长，在少而精的原则下进行派遣。

⑵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

即送刘、朱、陈、乔木[2]阅，尚昆[3]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

毛

四月廿八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三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本篇（二）（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⑵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⑷　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

关于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和按语[1]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

送乔木[2]同志：

此篇[3]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　泽　东

四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二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4]，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

设性的意见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载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

注　释

〔1〕　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载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指李汝祺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4〕　毛泽东替李汝祺的文章重拟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经毛泽东推荐，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

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一

刘、周、朱、陈、邓、彭真[2]阅，小平办。

此件[3]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毛　泽　东

五月五日上午十时

此事[4]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二

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

毛　泽　东

五日

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

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少奇委员长！

恩来主席！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毛泽东注）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

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毛泽东注）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毛泽东注）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毛泽东注）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节，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至于领导上工作太长期高度紧张，这点确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须在安排对内对外工作时，尽可能使倾向宽舒，似乎各位领导者都有这样必要。如荷同意，亦乞通知进行。

披沥直陈，统希亮察。

顺致

崇敬！

陈　叔　通

黄　炎　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

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㈠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㈡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根据批注件刊印。

注　释

⑴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二届人大不提名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五月五日，毛泽东在看这封信时，在信中写了四条批注并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即本篇㈢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此外还有两件批语，即本篇㈠㈡，这两件批语分别写在单页纸上和陈叔通、黄炎培的信的第一页上。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

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⑶ 指经毛泽东批注的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

⑷ 指毛泽东关于下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不再提名选举他为国家主席的建议。

对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稿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十一日）

一

伯达[2]阅，小平[3]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4]，在报上发表。

毛　泽　东

五月七日

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5]。

二

可用。公开发表[6]。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级领导人员

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上。这一初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毛泽东于五月十一日又作了批示，即本篇（二）。

⑵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⑶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⑷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再次审阅这一指示稿时，将文件的日期定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

⑸ 毛泽东在指示初稿第四页上只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⑹ 这一指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萨波托斯基、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和总理威·西罗基，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

贺电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纪念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为这些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不久以前，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我们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文化合作协定和保健合作协定。这不但对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有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贺电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祝中捷

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给李淑一[1]的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子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2]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3]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4]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⑴　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杨开慧的好友。

⑵　开慧，即杨开慧，毛泽东的夫人。一九三〇年牺牲。

⑶　直荀，即柳直荀。一九三二年牺牲。

⑷　柳午亭，柳直荀之父。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2]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　泽　东

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解放日报》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五月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事情正在起变化[1]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

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的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

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

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拍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

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

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哪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原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其上方加写了“内部文件，注意保

存”字样，题下加写了说明：“（此文可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写的）。”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在此页上写了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是：“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第二个批语是：“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在清样上毛泽东还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六月十二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又在第一页上删去了题下说明，将署名改为“毛泽东”，时间定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并在右上角“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后加写了以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当年和第二年均未发表，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

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⑴ 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露暴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㈠ 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

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 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 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接受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我很愉快地接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任命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你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勤劳、勇敢并且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解放后的十二年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久以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匈牙利反动分子利用广大人民对过去领导所犯的错误的不满，策动了一个企图推翻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但是，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依靠苏联的国际主义的援助，彻底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匈牙利人民的这个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团结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民主力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深信，匈牙利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沿着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中国人民一向密切关怀匈牙利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事业所进行的斗争。并且把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人民在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永远可以指望六亿中国人民的衷心的支持。匈牙利人民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直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中国人民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增长，不但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将加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你出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你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你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接受蒙古大使苏诺姆·鲁布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委任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向你表示热烈的欢迎。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几年来，中蒙两国人民的真诚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并且对增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也具有重大意义。大使同志，在你为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预祝你的工作获得成功。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的信[1]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给我的来信。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八百七十万人，其中七百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一百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牧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

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八千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

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

兄弟的敬礼！

毛　泽　东

1957 年 5 月 20 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在审阅这封信的代拟稿时写了如下批语：“退周总理：是否可以加上派去的人在教会他们的人以后即可撤回来这样一个意思。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根据这个批语，信中增加了“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一句。

关于制止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行为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陈云[2]同志阅后，转李先念[3]同志阅，退毛。

我看此种现象不但福建有，各省都可能有，似宜采取措施，加以处理。可否举行一些典型调查，然后制定一个法令。不然，如福建那样，是危险的。

毛　泽　东

五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一八号上。这份简报摘报了福建省监察厅党组关于晋江专区税收工作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简报说：福建省监察厅等单位最近重点检查晋江、大田等七个县的税收工作，发现违犯政策、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护税组织胡作乱为，随便拘人、扣货、变卖商品、动用税款。二、滥施处罚。三、不经批准，滥行搜查。李先念看了毛泽东批阅的这份简报后，于五月二十九日向陈云、毛泽东建议将福建省的这个报告转发各省市。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3〕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原载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对转载《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

乔木[1]同志：

此篇[2]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新闻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刊载的小雅写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在整风运动中，章乃器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文章说：“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

‘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小雅不同意章乃器的这些说法，他在文章中说，所谓“特种性格”、“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特殊”自居了，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根据毛泽东的批语，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1] 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

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六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尚昆[2]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

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六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为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转载《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

乔木[1]同志：

此文[2]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

毛

六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文汇报》登载的笪移今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对待整风应做到：第一，要认识党有伟大的气魄。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是大公无私、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是党的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些党性不纯的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从团结人民出发所产生的后果。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克服缺点的决心。第二，要学习整风文件。学好文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置身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时代中，使我们善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善于识别社会演变的方向，善于处理个人利益

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懂得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第三，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现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搞好团结。要接受过去运动有些过火批评的教训。第四，要明辨是非。非党人士帮助整风，要在接受党的领导下，要在不与党对立的认识下，监督党贯彻整风政策。既要大胆批评，又要避免冤枉人，发现批评离事实太远，要出来说话。第五，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协助领导共同解决矛盾，缩小矛盾。对于人民提出的过高要求，对于暂时办不到的事情，知识分子更应该用笔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第六，要从帮助整风来改造自己。第七，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整风的目的就是巩固党的威信，加强党的战斗力量，使党能更有效地团结六亿人民，充分贡献力量，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不能把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这篇文章，后来未见转载。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

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对反右派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这样的论断：“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同年九月至一九八一年年底，基本上复查改正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在本册中提到的当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章乃器、李康年、浦熙修、高方，在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〇年得到了改正。

在陈正人[1]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信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陈伯达[2]同志：

此件[3]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

毛　泽　东

六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指陈正人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写给毛泽东的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信。信中建议在稿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一句前面加上"革命时期"四个字。并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两个革命——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胜利，革命（社会改革）已基本结束，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

种斗争，不但表现为长期的思想上的斗争，也表现为政治的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如经济的）”。后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采纳了这一建议。

给孙燕[1]的信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孙燕，学名孙佩君。她的母亲陈玉英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一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㈠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㈡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⑴善意欢迎；⑵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

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1]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2]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

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二

即送刘、周、陈、朱⑶阅，尚昆⑷用电报发出。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章乃器，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康年，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⑵　章伯钧，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⑶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指朱德。

⑷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了解清华大学动态给蒋南翔、陈舜瑶[1]的信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

南翔、舜瑶同志：

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蒋南翔，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陈舜瑶，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兼副教务长。

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一

乔木[2]同志：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

毛　泽　东

六月十三日

二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 对待 对待批评”[3]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毛　泽　东

六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这两条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日报》第一版上。

⑵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⑶　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清样稿）的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篇社论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2]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

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载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

章如下”。

⑵　指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一文。文章说，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例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毛泽东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文汇报的标题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再如，李维汉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用“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文章批评了文汇报上述这些做法和“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观点，认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给达赖喇嘛[1]的复电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五月二十三日拍给我的电报收到了。谢谢。

西藏和平解放六年以来，在你和班禅额尔德尼[2]的领导下，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伟大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望你继续努力，把西藏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进一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3]，使西藏更加团结、进步和发展。祝你

身体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第一副主任委员。

〔3〕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条。

给班禅额尔德尼[1]的复电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周年的时候，拍给我的电报收到了。对你的祝贺，致以谢意。

西藏在和平解放以来的六年期间，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绩。但是建设西藏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希望你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协助达赖喇嘛[2]领导、团结各方面的爱国进步的力量，一道前进，在执行协议十七条[3]、建设西藏的工作中作出更好的贡献。祝你

身体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2]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

员。

〔3〕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条。

关于发表赵一明[1]发言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

彭真、维汉[2]同志：

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3]，是否已经在成都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请告新华社用新闻形式转发；如未发表，请商李井泉[4]争取发表，然后新华社再发表。

毛　泽　东

六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赵一明，当时任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指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揭露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同年四月民盟中央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言论及其对民盟地方组织的影响。六月十六日，《四川日报》刊登了这一发言。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4〕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了解北师大情况给何锡麟[1]的信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

何锡麟同志：

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你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何锡麟，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

接受朝鲜大使李永镐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你递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国书，并且感谢你热诚的祝贺。

中国人民经常关心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成就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为实现朝鲜的国家统一、为建立朝鲜南部和北部之间的联系所提出的许多合理建议，不仅为全体朝鲜人民所拥护，而且也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近年来，朝鲜国家领导人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对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有重大意义。

几年来，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已经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中国人民将继续加强同朝鲜人民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的事业继续给予支持。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你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你的工作中，你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七年六月）

一

即送乔木[2]同志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

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三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不平常的春天》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此文一、二两次清样稿时，都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第二次清样稿作了修改后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在清样稿上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⑵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接待许志行给韶山乡的信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韶山乡人民委员会
生产合作社委员会各同志：

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再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问候你们！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即送周总理：

在讲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

毛　泽　东

六月廿五日早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主要是在几处提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面，加写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九个字。

对美国《新共和》杂志一篇文章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陈云[2]同志：

17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有人提议农业投资应占20%，少了不利，请你研究一下。

毛　泽　东

六月廿六日早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一四三五期封面上。该期第十七页至十九页刊载了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的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文章。文章在“垮台论”的小标题下，一开头便说：“‘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在旁边批示，“这一句请你研究一下——毛”，并给陈云写了这一批语。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印发《整风专辑》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小平[1]同志：

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廿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每单位有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廿七日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谭震林[1]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毛　泽　东

六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谭震林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关于在湖南省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他在老家湖南省攸县住了四十多天，根据民主办社的方针，亲自领导整顿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整社中发现，目前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部之间造成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不民主，帐目不公开，从而引起社员对社干部的很大怀疑。通过财务清算，公布帐目，并且对少数贪污、占小便宜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处理后，社员的怀疑解除了，生产情绪提高了，同干部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关于县级机关整风问题，报告说，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

一是干部的特权思想较严重，二是在工作中存在狭隘的阶级观点，三是官僚主义发展到不愿动手动脚的地步，写东西都推给秘书干事，县级干部下农村的时间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中央规定县级千部一年应有六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县级机关整风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关于转载和播发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乔木[1]同志：

郭沫若此篇[2]，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3]，新华社全文播发。

毛 泽 东

六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反击右派的谈话，题为《拨开云雾见青天》。载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3] 郭沫若的这篇谈话，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 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1]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 400 人左右，全国大约有 4000 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

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 浦熙修—— 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

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

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

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温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根据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

中央，并请转罗瑞卿、王任重[1]二同志：

我拟七月廿四日到重庆，廿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2]。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3]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毛　泽　东

七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给毛泽东复电说，关于在三峡游泳一事，常委提出先派人调查和试水，然后再作决定。后来，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

⑶　孙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韩队长，指韩庆余，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一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2]，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

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中　　央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中央：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3]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　泽　东

七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这个通知给中央的便信。

⑵　在这个通知之前，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

⑶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阿尔维齐德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祝蒙古人民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7 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计划。

祝中蒙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7月9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维护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保卫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中、波两国总理的互相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促进了中波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祝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保障欧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

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 年 7 月 20 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

（一九五七年七月）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

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

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

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

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

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

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

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有手稿）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和九月在党内印发。这篇文章，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在七月二十日稿上，毛泽东在他以前写的“内部文件，不得遗失”的后面，加写了“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在这次修改后的印稿封面上，他将“地委一级”改为“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的一级”。在七月二十五日稿的封面上，他将以前题下写的“（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改为“毛泽东”、“（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和各省市书记在青岛谈话的一些要点）”。在七月三十日稿的封面上，他写了批语：“小平同志：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毛泽东　七月卅日。”此稿于八月一日印发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此后，毛泽东在这个下发的印件上又作了一些修改，将第一段中“资产阶级反动右派”改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第二段中“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一句前加写了“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等字，在第三段中“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句后，加写了“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等字；并将封面上的“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发至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改为“内部文件，注意保存，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这一修改稿当年没有再印发，后来编入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公开发表。

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

一

刘、邓[2]：

此件请提政治局通过，发出。省属市委提名是否恰当，请酌。

毛

七月卅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各地委；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旅大、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广州、长沙、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太原各省属市委：

决定于今年九月下半月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请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自治区党

委、地委、上开省属市委选派代表一人参加，最好是第一书记。省级第一书记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者，不再选派代表。议程主要为：㈠整风问题；㈡农村问题。特此通知，请各有资格到会的同志们在会前对此两项问题加以研究为盼。

中　共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本篇㈠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稿上的批语；本篇㈡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

⑵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㈠ 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㈡ 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㈢ 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㈣ 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

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给林克[1]的信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2]（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做什么？》，今译为《怎么办？》。《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发表于苏联《真理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金科奉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当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战后三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欢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和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不仅为全体朝鲜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祝朝鲜人民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8月13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欣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二周年，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热诚的祝贺。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深厚友谊，通过阁下去年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已经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增强，祝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昌盛和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8月15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1]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另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成为左派。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

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而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前进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不过多数人口里不说罢了。但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

二

鉴定工商界的右派分子，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当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结合去年高潮以后的言行，除了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许多极右分子以外，不要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因为工商界在实行企业合营以前，是立足于合法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是自然的和合法的，而在高潮到来以后，由于实行了全行业合营，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确已跨进了一大步，再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便不得人心和不利于争取多数。这一段时间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给达赖喇嘛[1]的信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2]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

愉快！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根据审定的信稿刊印。

注　释

⑴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⑵　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关于同意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1]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

退人民日报吴冷西[2]同志。看过，可用。

毛　泽　东

八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人民日报》送审的陈其通、陈亚丁写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的清样稿。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同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作了自我批评。当时马寒冰已经去世，鲁勒正在国外。

[2]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彼·格罗查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基·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扬·格·毛雷尔同志：

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欢欣的心情注视着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 年 8 月 21 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祝贺马来亚独立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日）

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陛下：

欣闻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谨向陛下和马来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马来亚联合邦繁荣和马来亚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 年 8 月 30 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当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1〕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祝越南人民在为祖国的独立、和平和统一，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越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8月31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以及《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这些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恢复和平，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尊重这三个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对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九月）

此件[1]可用。略有修改。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第四次修改的草稿）。指示说：正确执行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曾是我国顺利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今后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保证。实现合作化以后，互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经过合理的生产分工和合理的分配，恰当地调节各社员之间，尤其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收入问题。指示就认真贯彻执行互利政策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对于可能减少收入的社员，首先是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应该在劳动生产分工和经营社内及家庭副业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二、适当地调整入社后减少收入的非农业户的工作，使能得到合理报酬，增加收入。三、对某些特殊生产资料的原主，可以部分或全部暂不入社，仍归原主经营，也可以入社后仍包给原主经营，实行比例分益，在包工包产上

给予适当照顾，使他们能增加一部分收入。四、成片的果树、林木一般应该由社统一经营，实行比例分红，已折价入社的，如社员意见很多，也可改为比例分红。五、对于入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多余的折价款和社员的投资，应按期归还，并付给应得的利益，折价过低者，则按入社时的一般市价作适当的调整。六、多民族地区的民族联合社，要注意特别照顾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社员的经济利益。七、应允许社员家庭饲养家畜，并完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如要使用社员的耕畜，应付适当租金。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卢卡诺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十分欢欣的心情关注着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亲密的合作下，在建设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

一年以来，中保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的发展将一定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且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祝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

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7年9月8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一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

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

一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一[3]再加斟酌。

毛　泽　东

九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

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所作的修改。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⑵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⑶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为查找《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写的批语[1]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

林克[2]：

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四期。

毛

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旁边。这篇摘要摘自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原载《哲学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给 陈 云[1] 的 信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陈云同志：

八月廿八日的信收到。你父亲[2]入党时间及其工作情况，我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期我不在湖南。你们努力工作，帮助你母亲[3]治病，甚慰。请代问你母亲安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在湖南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员。

〔2〕　指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一九二九年年底，受中央军委派遣去湘鄂西协助贺龙工作，途中被捕，一九三〇年二月被杀害。

〔3〕　指陈昌的夫人毛秉琴，早年同毛泽东熟识。

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

副总统阁下，
同志们、朋友们：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印度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拉达克里希南博士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感谢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伟大的印度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印两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使我们的传统友谊有了新的基础，新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都在建设自己的国家，都在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为了这些共同的目标，我们两国进行着亲密的和友好的合作，中印两国十万万人民团结在一起，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扭转这个形势。但是，正像去年埃及人民和现在叙利亚人民向全世界所表明的那样，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挑衅一定会遭到最惨重的失

败。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人民历来对勤劳、智慧的印度人民怀着极大的敬意。我们庆贺印度人民在和平建设中的每一个成就。我们敬佩印度人民对于国际和平事业的出色贡献。我们特别感谢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正义支持。我们毫不怀疑，印度将在世界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提议，

为印度共和国的繁荣和印度人民的幸福，

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世界和平，

为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阁下的健康，

为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沙德阁下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

一

即送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

毛　泽　东

九月廿日上午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我们应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准备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时加写的一句话。这篇报告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转载上海工商界批评高方的报道[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乔木、冷西[2]同志：

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

毛　泽　东

九月廿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新民报》晚刊刊登的《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作了转载，题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好——介绍上海工商界对右派分子高方的说理斗争》。高方，当时任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关于印发《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小平[2]同志：

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毛　泽　东

九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一种简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庆之夜会见各国贵宾时的谈话[1]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

毛主席同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托菲克·雅兹谈话时，祝叙利亚独立、繁荣和强大，祝叙利亚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人们高兴地看到叙利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团结，所有阿拉伯人民都要团结起来。"毛主席还请托菲克·雅兹转达他对叙利亚总统、总理和一切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问候。

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对中国人民对叙利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还转达了叙利亚总统对毛主席的问候。他说，希望叙利亚总统能有一天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说，很可能。

在同埃及客人们会见的时候，毛主席请客人们转达他对纳赛尔总统的问候，并祝埃及人民好。

毛主席同美国青年谈了话。他说，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能够在和平中友好往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注　释

⑴　这是新华社发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会见各国贵宾》的新闻报道中的一段。

给林克[1]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漠吧？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2]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　泽　东

十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六朝文絜》，是清代许梿选编的一本骈体文集。该书选录晋至隋的骈文七十二篇，大多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美的抒情写景名作。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月六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奈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之际，我们谨向你们和全体德国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深切地关怀着德国人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为建立统一、和平和民主的德国，为完成国内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艰巨的斗争，并且为德国人民所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年来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相信：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德两国人民，而且必将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

的事业作出有力的贡献。

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中 国 共 产 党　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务 院 总 理　周恩来

1957年10月6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这次会议的评价：

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

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

大胆的改，彻底的改，坚决的改。

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部〈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

四十条[1]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十年了，要完成“四、五、八”[2]。

六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四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3]

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五年突击，三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四无国。

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4〕，值得一阅。

红安县的经验〔5〕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十年计划，十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八年，十八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十年，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⑹，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一次三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⑺

军队军〈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十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肖楚女、齐白石、高尔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⑻为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这个纲要（草案）先后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十月十六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

修改，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纲要（修正草案）。

⑵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四、五、八”是上述粮食平均亩产指标的简称。

⑶ 指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在《一个搞好卫生工作人财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中介绍的广东省乐昌县岐乐农林生产合作社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爱国增产卫生运动的经验。

⑷ 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从浙江省的情况看，要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的在今后十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八百斤的指标，除主要依靠农业合作社的力量外，还必须从工业、商业、文化教育方面的密切协作中来求得解决。在工业方面，要求解决发展农业生产的化肥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合作社发展副业门路等问题；在财政贸易方面，要求解决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价偏低的问题、商业对农业的投资等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解决普及问题尤其是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普及问题、国家的教育计划按照农村情况作适当调整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有的已经着手解决，有的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有的需要中央在政策和体制上作相应的调整、变化来解决。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将这个报告印发给参加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对

这一报告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印在报告的封面上："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第二个批语印在报告第一页的标题下："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一九五七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报告〕给我。他们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写成寄来了。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5〕　指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一九五七年九月写的《合作化改变了老苏区的面貌，红安县一九五七年获得了社社增产，样样丰收》的报告所介绍的经验。报告说，为了切实领导好农业生产，红安县县区干部深入农业社和生产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同时亲手试办高额丰产的试验田，进行典型示范，使领导干部开始懂得农业生产知识，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克服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改变了过去空谈政治的领导作风；农业技术干部通过试验，也开始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和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更好地推广了农业技术；农民从高额丰产的实验中，也提高了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克服了保守思想，积极改进了对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总之，通过办试验田，使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和农业社的管理三个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

〔6〕　厉家寨，乡名，属山东省莒南县。该乡的大山农业社以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作艰苦斗争而闻名全国，被毛泽东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一个好例。参见本册第 599 页。

〔7〕　指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一九五七年十月八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发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精简、整风、政法等问题的发言和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作的《一个搞好卫生工作人财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

⑻　肖楚女，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齐白石，中国现代画家、篆刻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高尔基，苏联著名作家。玄奘，唐朝高僧，与南北朝时的鸠摩罗什、真谛合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创始人之一。惠能，唐朝高僧，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梁鸿，东汉文学家、诗人。富兰克林，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对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一

此件[1]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查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二

此两件[2]立即付印。本日下〔午〕三时三中全会开会

时发给每人一份。请尚昆⑶办。

毛　泽　东

九日上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题为《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记大山农业社建设山区的丰功伟绩》。

⑵　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报告和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批语。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祝贺威廉·皮克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在你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时候，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总统同志，你的任期的延长，再一次证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对你的无限的信任和真挚的爱戴。

祝你为在和平民主原则上统一德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0月9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探讨辩证逻辑对象问题的一篇文章[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

送陈伯达[2]同志。这里辩证逻辑一文可以一阅。此人有些新颖见解。阅后还我。

毛　泽　东

十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五七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且大有《对于探讨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认为，近几年来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迄至目前为止，仍然束缚于恩格斯的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相互关系的比喻，没有多大的进展。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本身的问题没有弄明白，就来谈二者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受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文章就讨论中涉及的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个人的意见：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等）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

的科学。二、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㈠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一般的客观辩证法，研究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领域，是研究其中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研究的是主观辩证法，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㈡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㈢阶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它是研究思维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和形式的辩证思维。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方法；至于证明、假设和类推的问题，也有以辩证逻辑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必要。

⑵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

一

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2]同志看一遍，印若干份发给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人，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一次，争取于十月廿日在报上公布[3]。政治局是否还要讨论一次，请刘邓决定。

毛　泽　东

十月十二日

有所修改，是否妥当。

阅后退田家英[4]办。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

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

三

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者，听其自便。

四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

五

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

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

六

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七

除疾病的根本精神，跟除四害是一样的。

八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印发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此稿序言部分的修改，

后来公开发表时，这一段话改为中共中央对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个注；本篇（三）至（八）是毛泽东分别对此稿的第一、第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八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⑶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改后的草案先后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十月十六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纲要（修正草案）。

⑷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给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

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舒克利·库阿特利先生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时，承蒙来电祝贺，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衷心的谢意。

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祝中叙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祝叙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祝叙利亚共和国繁荣和阁下身体健康。

毛　泽　东

1957年10月17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命令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各级党委：

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㈠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㈡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个至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㈢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㈣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㈤群众所提修改意见，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㈥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㈦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㈧民主党派，知识

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织他们加以讨论。

中　　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廿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1]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布尔加宁[2]同志，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受中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莫斯科向我们的苏联兄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在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先后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都邀请我再一次访问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最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对于所有这些友好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都表示非常的感谢。

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

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把侵略和战争的矛头指向阿拉伯民族，指向独立的叙利亚。这种侵略企图有导向世界战争的危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对侵略者的严重警告。全世界人民都应当警觉起来，为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同志们，我们将永远站在一起，为着世界和平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光荣归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光荣归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抵达莫斯科机场时的讲话。在讲话稿上，毛泽东写了以下批语："（一）印发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二）即刻翻成俄文和英文；（三）送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各一份，请提意见，阅后收回。"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即沈雁冰）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⑵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亲爱的同志们：

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节日，我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全体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谨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和朋友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中经历了艰苦的路程。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敌人曾经显得好像比苏联更强大，他们两次武装进攻苏联。但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把这些侵略者的进攻彻底地粉碎了。

苏联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一个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国家，是一个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真正反对民族压迫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本国全体人民的热烈支持，同时有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两种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是各国的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

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所有这些，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对此感到不高兴的，只是一些反动派。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的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

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同样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现在全世界踏上十月革命道路而赢得胜利的，已经有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了九亿多人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早已丧失了优势，社会主义早已变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

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争。但是他们能够从战争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苏联在裁军问题上，在禁止制造、使用和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上，所一再提出的建议，代表着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主张，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美帝国主义顽固地要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在中国干涉解放台湾，在匈牙

利制造反革命叛乱。它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现在还在策划通过土耳其或以色列侵入独立的叙利亚，还在阴谋颠覆反殖民主义的埃及政府。美国的这种疯狂的侵略政策，不但造成了中东的危机，而且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都站在叙利亚方面，反对美国和土耳其的侵略者，正如他们在去年十月都站在埃及方面，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者一样。苏联政府已经向美国和土耳其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迅速打消侵略计划。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的卫国斗争，坚决支持苏联的正义立场。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帝国主义曾经而且还在继续竭力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它终究无法阻止中国的六亿人口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八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可能有的成就。中国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中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亲密的联盟。他们的这种狂妄企图，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反击之下彻底失败了。

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须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我们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教育运动，大概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今后，我们准备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期各项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须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们方面的，是讲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经验所证明。

我们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说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苏联的多方面的兄弟般的援助。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请让我们对于给予中国这种友好援助的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

好同盟互助的条约。这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采用一切挑拨离间的手段，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和团结。但是，事实只能使帝国主义者失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得愈来愈紧密了。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这样说过："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个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九十几年前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永远不会过时。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

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公布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的命令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第八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

一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2]同志？

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去年这一年，帝国主义搞了一个风潮，在我们脸上擦了一点黑。今年好了，天上没有乌云了。而西方世界的天上有相当多的乌云。我们的事情更好办了，杜勒斯⑶却比较难于睡觉。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

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五百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五百公斤。搞一个五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赫鲁晓夫[4]同志你干不干呀？(赫鲁晓夫同志插话：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能。)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主要由你努力。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5]了。罗斯福不是讲过"免于恐怖"吗？资产阶级政治家有时候也讲几句好话。不过他们讲的是一回事，作的又是一回事。要免于恐怖，要有五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

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譬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我提出这个意见，同志们要批评尽可以批评。各国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你们不赞成请你们批评我。

二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6]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

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方法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譬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

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三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 ?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

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7]，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8]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9]，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

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10〕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11〕，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它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12〕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

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13〕，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14]。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人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

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15〕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

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忆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

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16〕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节〈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

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 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

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17〕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譬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18〕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

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 ?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笆篱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 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 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

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19]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20]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

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

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也许你们讨厌我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讲这样一类问题。我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时间又讲得很长了，那就不讲了吧。但是，我还要讲几句。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

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刊印。十八日的讲话已节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⑴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⑵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⑶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⑷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⑸　“免于恐怖”，指“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同“言论和表达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被称为“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宣扬和期待的一种新世界的秩序。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在我们力图保持安宁的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自——遍及

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 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 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 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 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 遍及世界各地。”

〔6〕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载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7〕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

〔8〕 指英、法垄断资本为重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发动的侵略埃及的事件。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三十一日，英、法从海、空袭击埃及，随即入侵埃及领土。埃及军民奋起抗击，世界舆论强烈谴责英、法、以的侵略行径。十一月二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要求有关各方立即停火。十一月四日，联合国派出紧急部队监督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英、法军队撤出埃及。一九五七年三月，以军也撤出埃及领土。

〔9〕 法斯特，美国作家，曾写过一些反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和维护民主权力的作品，参加过国际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之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10〕 丘吉尔，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任英国首相。

〔11〕 雅尔塔，在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12〕 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二年任美国总统。

〔13〕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规定法国部队集结在北纬17线以南。这样，就把大半个越南划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14〕 先锋计划，是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想使美国在人造地球卫星这一领域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15〕 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6〕 指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历）在俄国发生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7〕 哥穆尔卡，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8〕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载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19〕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

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20〕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运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张国焘，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高岗，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党。

公布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的命令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1]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

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它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团结一致，表现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一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经过四十年，新世界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现在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二

毛主席首先向留学生、实习生问好，然后向他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奇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非常有风趣的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和掌声。

接着毛主席在讲话中给大家谈了当前国际形势，他首先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两个人造卫星上了天，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敌人也有一个头，就是美国。如果没有头，力量就会削弱。毛主席说，世界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到这里，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然后毛主席又谈了国内的情况。他说：真正的彻底的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现在右派是打垮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这次整风是件很大的事，我们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最后，毛主席再次祝贺大家，向大家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

毛主席走到后院的学生俱乐部，那里聚集着大礼堂容纳不下的中国留学生。毛主席向他们问好。这时几百双眼睛望着毛主席，好像同时在说：我们刚才只能从麦克风里听到你的讲话，现在再给我们讲两句吧！“我只给你们讲三句”，毛主席望着大家微笑地说：“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新华社报道的毛泽东向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本篇（二）是《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集体采写的《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一文中报道的毛泽东同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

为感谢苏联人民的情谊给《真理报》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真理报》编辑部：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你们伟大国家的逗留期间，收到了苏联公民们的大批信件和电报，其中有的还附来了珍贵的礼品。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都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它的成员以及对我个人的最诚挚的兄弟情谊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们把苏联人民的这种感情看作是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象征。因为我和我的同志们难以对这么多的信件和电报一一作复，请让我们通过贵报转达六亿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们和我个人对苏联人民、对所有给我们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的苏联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于莫斯科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给苏联领导人的感谢电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1]：

当我们将要离开伟大苏联的国土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再一次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和访问你们的伟大的国家，感谢你们对我们非常亲切的接待，感谢你们对我们和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深厚的兄弟情谊。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同志们身体健康，祝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永远巩固和不断发展。

毛　泽　东

1957年11月21日　伊尔库次克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⑴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祝贺诺沃提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欣悉你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谨以中国人民和我个人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你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授予你最高国家职位，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对你无限的信任和爱戴。

祝你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1月21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2]同志转小平[3]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4]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作了修改，于十一月二十日再送毛泽东审阅。这篇讲话后来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文艺战线

上的一场大辩论》。

⑵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⑶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⑷　指胡乔木。

给张明霞[1]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明霞同志：

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

《蝶恋花》[2]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3]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张明霞，当时在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读书。

⑵　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在给张明霞的这封信中，毛泽东改《游仙》为《赠李淑一》。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这首词的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⑶　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九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长沙市第十中学李淑一处抄录毛泽东写的《蝶恋花》词以后，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

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允许在《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回信时《鹰之歌》已停刊，这首词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和解放纪念日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霍查同志：

当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四十五周年和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四十五年前，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反对土耳其的黑暗统治、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信心。后来，在反法西斯的解放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的英勇、刚毅、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精神，受到了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十三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

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于这些成就感到极大的欢欣鼓舞。

近年来，中阿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以彭真⑴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以里塔·马尔科⑵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的相互访问，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合作关系。

祝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幸福生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阿两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⑴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一九五七年一月曾率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⑵　里塔·马尔科，当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一九五七年五月曾率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国务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同志：

当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的友谊几年来获得了不断的发展。今年，以彭真[1]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南斯拉夫的访问，以及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以斯坦鲍利奇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的先后在我国进行的友好访问，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南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友好合作。

祝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⑴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给印度尼西亚总统
苏加诺的慰问电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获悉阁下于十一月三十日突遭歹徒袭击。谨向阁下致亲切的慰问，并且对这次事件中不幸牺牲的人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为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失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一

送胡乔木[1]同志：

（一）此文[2]好，转载并广播；（二）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3]，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4]一商，指人起草，两星期内务必发出；（三）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5]。

毛　泽　东

十二月七日

二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6]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

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7]，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8]，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五日八时

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三

乔木同志：

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可

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⑼。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⑵　指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发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刊载。

⑷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

⑸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同时，发表了《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

⑹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

⑺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⑻　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这些讲话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印发给到会代表。见本册第625—644页。

⑼　指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

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九张有关的照片。同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特写、社论和其中的一张照片，报道的题目改为《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无蝇镇—— 吴兴南浔》。

祝贺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召开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
阿·尔·达姆波先生转
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

值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四十五次年会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祝你们在团结南非各族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中不断获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1]给叶子龙[2]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3]、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共九个部分：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二、农村工作；三、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四、财贸工作；五、知识分子工作和文教工作；六、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七、肃

反问题；八、军事工作；九、党的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有起伏的。在这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被迫退却，斗争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这种斗争的起伏形势，将在若干年内反复地发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报告批评了当时党内看不到敌我矛盾仍然存在的右的倾向和夸大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左"的倾向。这篇报告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指出："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报告针对党内的思想分歧，批判了忽视敌我矛盾和夸大敌我矛盾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里所批判的错误观

点，目前在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内也是存在着的，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理论性原则性的问题展开大辩论，对于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贯彻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有很大的意义。”在江华作上述报告半个月后，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审阅了这一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一段话后面加写了“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一句。

〔2〕 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给周世钊[1]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惇元同志：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

祝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给　李　淑　一[1]　的　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淑一同志：

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五百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

顺祝教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十二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杨开慧的好友。当时在长沙市第十中学任教。

给　孙　燕[1]　的　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配君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问你母亲和你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有手稿）

注　释

〔1〕　孙燕，学名孙佩君。她的母亲陈玉英一九二六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一九三〇年十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对陈赓关于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报告[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退彭德怀[2]同志：

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给彭德怀并军委的报告。报告说，台湾飞机今年多次偷入大陆沿海重要城市和内地，空投了大批反动传单和"慰问品"，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由于部队有些领导同志对防空作战思想上不重视和领导上检查督促不严，对窜入内地蒋机均未能将其击落。为了迅速扭转这种状况，我们已布置空军和各军区今后必须采取一切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可能入侵内地的蒋机给以应有打击，并力求将其击落。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的电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亚非团结大会：

亚非团结大会的召开，对于发扬“万隆精神”，促进亚非人民团结，争取和维护亚非民族独立以及对保卫亚洲、非洲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2月26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1]的批语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同意。

毛　泽　东

十二月卅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是周恩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后拟出的。关于撤回志愿军的办法，方案提出：全部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撤完，分为三批，每批各撤三分之一。第一批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撤回；第二批在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